

# 展示臺灣： 一九〇三年大阪內國勸業博覽會 臺灣館之研究\*

呂紹理\*\*

## 摘要

一九〇三年日本在大阪舉辦了「第五回內國勸業博覽會」，並且在會場內配置了極為明顯的空間以展示殖民地臺灣，這是日本統治臺灣八年之後，首度將殖民地呈現於世人面前的展示，同時還邀集了大批臺灣士紳赴日參觀。本文嘗試藉著此次博覽會，探討日本如何呈顯殖民地臺灣？進入會場的日本臣民用何種眼光來觀看理解臺灣？赴日參觀此次博覽會的臺灣士紳，他們眼中所看到的臺灣館、博覽會和日本本國又是何種面貌與景象？而這些觀看活動的背後對應了何種政治、經濟與社會文化的現象？本文發現，臺灣館的展示出現策展者伊能嘉矩與殖民政府理念不合的問題，顯示殖民者對於如何呈顯臺灣，以及如何理解臺灣，仍處在異質而紛殊的狀態。策展者理性精心設計的展示內容，觀者卻自有其解讀的脈絡，許多日人看完臺灣館後仍然認為臺灣多野番土匪，顯示臺灣館並未成功地將日本治臺的成果灌輸給日本人。至於「殖產興業」、「文明開化」這兩項博覽會所欲展示的主流價值，則成功地傳達給參觀大阪博覽會的臺灣士紳，然而臺人欲藉博覽會所吸收到新知改善教育與經濟環境，卻面臨總督府的層層制約，顯示博覽會即便傳遞了「殖產興業」的共同主流價值，但在現實層面上，臺灣仍然得放置在殖民地的遠端後進位置，不能任意超越母國。

關鍵詞：博覽會，勸業會，大阪，殖產興業，文明開化，日治時期臺灣社會文化史

---

\* 本文為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展覽會之畫：近代臺灣展覽活動（1895-1945）」（計畫編號：NSC88-H-2411-004-011）之部分研究成果。計畫期間得政大歷史所碩士班林果願、王飛仙兩位同學收集、整理材料之幫助，最是辛苦，在此謹申謝意。初稿完成後，曾於2001年6月28-29日發表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主辦之「國科會臺灣史專題研究計畫成果發表」研討會，在此要特別感謝評論人廖瑾瑗教授對本文詳盡的補充和批評，提醒筆者許多未注意到的盲點，也要感謝施添福、黃富三、周婉窈、蔡慧玉、蔡采秀、李若文、鄭麗玲諸位女士先生之寶貴意見。兩位匿名審查人的批評指正，更使本文錯誤能降到最低，謹此致最深謝忱。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 一、前言
  - 二、日本的博覽會經驗及其移植
  - 三、臺灣經驗：從品評會到博覽會
  - 四、大阪博覽會
  - 五、臺灣館的籌建
  - 六、臺人的遊觀活動
  - 七、臺灣觀覽者的反應
  - 八、結論
- 

## 一、前言

深坑廳告諭第壹號：深坑廳長丹野

剴切曉諭事。照得本年於大阪開設第五回內國勸業博覽會，自三月初一日起至七月三十一日止。只恐管內人民未識該會之爲何以設，蓋博覽會者，不論天造與人工，網羅諸物類聚一場，以供眾庶縱覽，且審查其有贊天地之化育者與否；有極意匠技能之精巧者與否；有補利用厚生之資者與否，以判其優劣立等第以行獎賞，其意在殖產興業以增進國民福。夫博覽會，世界萬（無？）時有之，即我邦亦非每年開設，或五年乃至十年一回開設爲耳。領台以來至今年始催會，爲帝國人民者，務須前往觀覽。凡本島物產亦陳列在場，共皆得從中觀覽。況欲往觀光上國者，趁此時爲最可，不特有博覽之益，且火輪車、火輪船等賃金均輕減十分之二乃至十分之三。時際陽春不寒不熱，鶯花好時節，借以爲勝遊，樂莫大焉。若夫道途費用，雖上中下人各不同其數，然或船或車，其室下等者往復需金貳拾餘元，中等者往復需金參拾餘元，到彼地一宿需金壹元，統計核算，淹留十日間須費金四、五拾元之譜，即得遊覽而旋歸。夫費金如此鮮少而所得之利益實大有不可思議者矣。故此我場勸

人民有資力者，務一往觀彼博覽會，以廣其見聞，以盛其事業，以裕其生理。至身心之快樂，則又有出豫思外者。豈非我國民之幸福哉！合行曉諭，閭屬人民一體知悉，為此特諭<sup>(1)</sup>

明治三十六年（1903）二月六日，時任深坑廳長的丹野英清草擬了這分布告，請人翻譯之後發布給深坑廳民，希望轄境內的人民能連袂參加當年在大阪舉行的第五回內國勸業博覽會。除了深坑廳之外，其他各地方政府無不卯足了勁，大力動員。這個在大阪市天王寺所舉行的第五回內國勸業博覽會，為期五個月，總共吸引了 435 萬人次觀覽，其中從臺灣送至大阪參加展覽的物品共計 6,028 件，2,751 個參展人；另外還有超過五百名以上臺灣士紳組團赴日觀覽。<sup>(2)</sup>這是一八九五年日本統治臺灣後，第一次有如此大規模臺灣人赴日觀光的事例，也是日本第一次將殖民地臺灣的史地、現狀和物產展示給日本國民知曉的事例，因此這次展示活動，不僅是眾多臺灣人觀看日本當時國內情勢的全新經驗，也是日本人第一次較為有系統理解臺灣物產風俗的機會，更是臺灣總督府日後舉辦各種博覽會的摹本。此外，由於會場中臺灣館的展示內容頗受時人重視，使得總督府注意到舉辦博覽會對宣揚殖民統治成果具有重大功效，在大阪博覽會結束之後，總督府及在臺日人莫不希望能在臺灣舉辦一個殖民地博覽會，以期更完整地呈現日本統治臺灣的成效，於是而有一九一五年在臺北舉行的「始政二十周年勸業共進會」的誕生。探討這些第一次的經驗為何，就成為本文的首要工作。

近十年間有關博覽會的研究已愈來愈受到社會文化史研究者的注意，除了筆者之外，<sup>(3)</sup>近年來有關博覽會的中文相關著作頗為豐碩，計有古偉瀛〈從「炫奇」、「賽珍」到「交流」、「商戰」：中國近代對外關係的一個側面〉<sup>(4)</sup>；馬敏，〈中

(1)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藏，《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光碟編號第 831/107 號，標點為筆者自加。

(2) 臺灣總督府民政局編，《臺灣總督府民政事務成績提要》，第九編（明治 36 年分）（臺北：成文出版社影本，1985；1903 年原刊），頁 353；大阪博覽會的參觀人數見古見俊哉，《博覽會の政治學：まなごしの近代》（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00，第 5 版），頁 127。

(3) 參見呂紹理，〈「始政四十周年紀念博覽會」之研究〉，發表於 2000 年 10 月 14-5 日行政院文建會主辦、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承辦之「北臺灣鄉土文化學術研討會」。

(4) 古偉瀛，〈從「炫奇」、「賽珍」到「交流」、「商戰」：中國近代對外關係的一個側面〉，《思與言》24: 3 (1986 年 9 月)，頁 1-18。

國走向世界的新步幅——清末商品賽會活動述評》<sup>(5)</sup>；趙祐志，〈躍上國際舞台：清季中國參加萬國博覽會之研究(1866-1911)〉<sup>(6)</sup>；鄭梓，〈戰後臺灣的第一場「產業盛會」——首屆「臺灣省博覽會」歷史影像之呈現與解讀〉<sup>(7)</sup>；王正華，〈呈現「中國」：一九〇四年美國聖路易萬國博覽會中的大清國〉<sup>(8)</sup>等專文。這些研究成果一方面勾勒出清末以來中國參加歷次博覽會的史實，及其對博覽會在促進貿易、刺激生產與技術交流等實質功能的認識；以及中國在博覽會中所呈顯的民族主義論述、主權領土與「國粹文化」如何視覺化的表述，同時也涉及博覽會中有關於歷史文化解釋權與認知上的差異。國外的研究成果更為豐富，與本文相關的研究取徑可簡單歸納如下，一是從文化霸權的角度來看，認為博覽會是十九世紀中產階級所建立的一套價值觀的展現。另一派則不同意所謂霸權的效力，因為任何一個觀覽者都會帶著他自身的意義脈絡重新解讀博覽會所傳達的內容，而有不同的理解，甚至會運用博覽會達到他們自身的目的，例如有學者研究美國印地安人，從霸權角度來看，少數民族只是博覽會中進步主義的點綴裝飾，用落後以突顯進步；但學者則發現美國印地安人則利用博覽會成功地將印地安人保留區的想法落實為政策，以保護印地安人的生存空間。<sup>(9)</sup>同樣的問題也出現在殖民地與帝國在博覽會中的再現／權力控制的討論，亦即從後殖民論述的角度來討論在博覽會中所再現的殖民知識，以及被殖民者對於此一知識的對應態度。<sup>(10)</sup>換言之，博覽會不僅涉及如何呈顯、如何「再現」的問題，也涉及觀者從何種眼光來理解博覽會各種展示的問題。

置放在大阪第五回勸業博覽會場內的臺灣館，既代表了許許多多「第一次」

- 
- (5) 馬敏，〈中國走向世界的新步幅——清末商品賽會活動述評〉，《近代史研究》1988: 1 (1988年1月)，頁115-132。
- (6) 趙祐志，〈躍上國際舞台：清季中國參加萬國博覽會之研究(1866-1911)〉，《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25 (1997年6月)，頁287-344。
- (7) 鄭梓，〈戰後臺灣的第一場「產業盛會」——首屆「臺灣省博覽會」歷史影像之呈現與解讀〉，收於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主編，《回顧老臺灣展望新故鄉：臺灣社會文化變遷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2000)，頁313-344。
- (8) 王正華，〈呈現「中國」：1904年美國聖路易萬國博覽會中的大清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近代中國的視覺表述與文化構圖，一六〇〇迄今」學術研討會，2001年9月6-7日。
- (9) Robert W. Rydell, *All the World's Fair: Visions of Empire at American International Expositions, 1876-1916*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pp. 2-8.
- (10) Timothy Mitchell, *Colonising Egyp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的新經驗，更在會場中形成許多交互錯雜的觀看角度。臺灣館的設計者如何呈顯臺灣？想要讓觀眾看到什麼樣的臺灣？放在大會的角度來看，這個日本第一個擁有的殖民地該被安排在會場的何種位置？進入會場的日本臣民用何種眼光來觀看理解臺灣？那些赴日本參觀此次博覽會的臺灣士紳，他們眼中所看到的臺灣館、博覽會和日本本國又是何種面貌與景象？而這些觀看活動的背後對應了何種政治、經濟與社會文化的現象？這些都是本文所欲處理的實質問題。

## 二、日本的博覽會經驗及其移植

一八六二英國在倫敦舉辦第二屆萬國博覽會時，日本的竹內使節團正好在歐洲訪問，使節團成員於是兼程赴會參觀。這是日本接觸萬國博覽會的開端，並且給予日本人莫大的刺激。五年後在巴黎舉辦的萬國博覽會，日本啼聲初試，首度參加萬國博的展示活動。這兩次參與博覽會的經驗，均使當時日本領導階層認識到博覽會具有重大的政治、經濟產業與文化宣傳的作用。此一時期，日本國內正瀰漫著「殖產興業」與「文明開化」的思潮，<sup>(11)</sup>舉辦博覽會既可刺激日本國內產業提升，又可宣揚「文明開化」精神，更具有提倡振興「國貨」的民族主義內涵。<sup>(12)</sup>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日本乃於一八七七年在東京上野公園舉行了「第一回內國勸業博覽會」。這次博覽會強調的重點是「物品的比較」，希望藉著博覽會使觀眾仔細熟看物質的精粗、製造的巧拙、使用是否合宜與價格之高下。<sup>(13)</sup>物質精粗優劣的比較其實還涉及到「產業情報」的收集、整理、研判與學習，博覽會等於是提供大量情報的場所，藉由收集展覽中所釋放出來的各種產業與技術的情報訊息，指引生產目標與制定價格，才能使產業獲得更大的利益，達到「殖產興業」

(11) 石田一良編，《體系日本史叢書·思想史·II》（東京：山川出版社，1990），頁253-265。杉原四郎、逆井孝仁、藤原昭夫、藤井隆至編著，《日本經濟思想四百年》（東京：日本經濟評論社，1992），頁232-240。

(12) 明治初期於各地舉辦「共進會」，其目的乃在發揚日本「國貨」優先的精神，以對抗當時大量輸入日本的洋貨。信夫清三郎著、周啟乾譯，《日本近代政治史：第四卷／走向大東亞戰爭的道路》（臺北：桂冠圖書公司，1990），頁8。

(13) 吉見俊哉，《博覽會の政治學》，頁124。

的目標。<sup>(14)</sup> 除此之外，第一次內國勸業博覽會設立了參展品的審查與褒賞制度。這套制度源起於一八六七年巴黎萬國博覽會，使得博覽會不再只是百貨充盈的堆積場，更加入了研發科學技術的學術氣氛。<sup>(15)</sup> 物質的精粗巧拙，都在審查制度之下有了比較的「權威性」基礎，形成一種產業「標準化」的規格，而這種標準規格的背後，其實隱含了「進步主義」的價值，<sup>(16)</sup> 也與日本當時「文明開化」的思潮相互呼應。抱持相同目的而舉辦的「勸業博覽會」日後還繼續舉辦了四次，<sup>(17)</sup> 一九〇三年的大阪博覽會則是「勸業博」系列的最後一次，也是規模最大的一次。

殖產興業是日本舉辦內國勸業博覽會的最初目的，不過，隨著日本在甲午戰爭之後將臺灣、朝鮮等地納入版圖，「勸業」博覽會的目標與內容也開始有了轉變。歐洲博覽會一開始時即將其所領有的殖民地納入展示的範圍，其目的乃藉殖民地的落後以凸顯歐洲國家文明的進步。這種歐洲中心主義的觀點在一八六七年巴黎萬國博覽會中表現得最為明顯，而日本在參加這次博覽會時，顯然也被會場中展示殖民地風土文物的做法所吸引。等到甲午戰爭之後，日本乃效法國之故智，將殖民地臺灣納入勸業博覽會的範圍裏，是以一九〇三年在大阪天王寺所舉辦的第五回勸業博覽會，不但脫離原來單純鼓勵日本人民「殖產興業」的目標，更包含了展現日本帝國國力的意味，<sup>(18)</sup> 臺灣正好是第五回內國勸業博覽會中展示帝國

- 
- (14) 園田英弘，〈博覽會時代の背景〉，收於吉田光邦編，《萬國博覽會の研究》（東京：思文閣，1996），頁9-20。
- (15) 吉見俊哉，《博覽會の政治學》，頁127-128。日本最早具有產業研究的展示活動，當以1751年於大阪所開之物產會為嚆矢。早先的物產會以植物、藥品之陳列展覽為主，藉由展品的收集、整理與鑑定，以達到普及知識、究明學問的目的，因此與商業的關係較小。參見椎名仙卓，《明治博物館事始末》（京都：思文閣，1989），頁43-47。
- (16) 十九世紀中期以後舉辦的博覽會，一直與進步主義思想有極為密切的關係，而1893年美國芝加哥的萬國博覽會是表現進步主義的極致，關於此一課題已有許多作品詳加討論，可參見James Gilbert, *Perfect Cities: Chicago's Utopias of 1893*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Robert W. Rydell, *All the World's Fair: Visions of Empire at American International Expositions, 1876-1916*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pp. 38-71; Stanley Appelbaum (author of the text), *The Chicago World's Fair of 1893: A Photographic Record* (N. Y.: Dover Publications, Inc., 1980).
- (17) 這五次內國勸業博覽會分別於1877、1881、1890、1985及1903年舉行，前三次的地點都是在東京市上野公園，第四次移至京都市，第五次改在大阪。見吉見俊哉，《博覽會の政治學》，頁127。
- (18) 吉見俊哉，《博覽會の政治學》，頁180-206。歐美博覽會中殖民地的角色問題，參見Burton Benedict, "Ritual of Representation: Ethnic Stereotypes and Colonized Peoples," in Robert W. Rydell and Nancy Gwinn eds., *Fair Representation: World's Fairs and the Modern World* (Amsterdam: UV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28-61.

光榮最重要的媒介。

理解了日本自身參觀以及舉辦博覽會的經驗後，我們將進一步觀察這種經驗在日本統治臺灣後，是在什麼樣的條件及過程下移植到臺灣？移植這樣的展示體系及經驗對於統治臺灣的作用與意義何在？

### 三、臺灣經驗：從品評會到博覽會

博覽會既是要展現一個國家政治、經濟及社會的實力，則任何一個博覽會的開設，勢必要依賴社會既有的動員網絡與動員能力，而存在於社會中原有的市場網絡及社群組織，就是形構博覽會最重要的動員基礎。日本統治臺灣後，在地方上舉辦的各種「物產品評會」和「物產陳列所」，就是為大型博覽會預作準備的組織體系。(19)

日本統治臺灣初期，即曾針對臺灣的水產及煤、金等礦藏進行調查，然而大規模對於臺灣島內各項資源進行調查，以進一步制定殖民地經濟產業政策，卻要等到一八九八年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上任之後才開始。兒玉將殖民地臺灣的經濟政策定位於開發臺灣資力與改進農業生產的方向，其中兒玉特別強調振興糖業、挽回茶業之頹勢、森林開發利用、米作改良、豬隻繁殖、保護牛隻、栽培煙草，此外，藍、苧麻、黃麻、紙張等物產，鳳梨、香蕉、柑橘等水果也都是他任內積極開發的對象。(20) 這些農產品就成為日後舉辦各式物產品評會的重要展示內容。

日本統治臺灣後，最早舉辦的物產會，當屬明治三十一年（1898）二月二十六至三十一日間於臺北舉辦之「內地物產展覽會」。同年三月十八日頒佈「物產陳

(19) 1877年日本於東京舉辦第一回內國勸業博覽會後，由於成效卓著，各地方政府乃紛紛仿效舉辦各式各樣的共進會、品評會。總計由1885-1898年間，日本境內各都道府縣舉辦的各種共進、品評會計達5,534次，參展者為2,105,907人次，而觀覽者更達16,502,658人次，對於技術模仿與改良、改善既有產業體質、刺激市場競爭、促進成立各種職業產業團體等方面具有重大貢獻。參見清川雪彥，〈殖產興業政策としての博覽會・共進會の意義——その普及促進機會の評價〉，《經濟研究》39:4（1988年10月），頁340-359。

(20) 井出季和太著、郭輝編譯，《日據下之臺政》（原名：《臺灣治績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56），頁409-412。

列館規程」則為規範展覽的法令依據。<sup>(21)</sup>不過，早在這項法令頒佈之前，臺南縣即已於明治三十年（1897）八月成立了「物產陳列場」，開幕之初，即吸引了 1,147 人次觀覽。<sup>(22)</sup>第一次以臺灣物產為基礎所舉辦的展示會，則為明治三十二年（1899）十一月一至七日在臺南市范進士街所舉行之「臺南縣農產物品評會」。<sup>(23)</sup>根據臺南縣為此次品評會所頒佈的「品評會規程」，整個展示品的審查組織分為審查長（一人）、審查官（八人）及審查員（十六人）三級，每次審查由至少三名審查員組成，進行初步審查，交由審查官做為評定等級的依據，最後再由審查長做最後的定奪。<sup>(24)</sup>審查官裏，只有一名臺灣人，至於 18 位審查員中只有 2 名日本人。<sup>(25)</sup>由於審查員是評定等級的關鍵，因此以漢人為主體的審查組織較不易引起漢人自身的疑慮，也有助於漢人對審查結果的認同。這次品評會總共包納了南部 14 個辨務署轄區內的農產物 2,403 件，受到官廳褒賞的物品有 360 件，獎勵件數達 14.98%。儘管受獎的物品為數不少，但是代表臺南官廳的日方審查官對於參展的農作物卻給予頗低的評價。例如米、麥、蕃薯、胡麻等農作「種類駁雜、調製粗漏」；砂糖「製作法不完全、品質不良」；在這樣嚴刻的審驗下，代表出品人的臺南士紳王雪農只能在品評會開幕式中以極為恭謹的態度說，這次品評會「合古者重農本意、行政要圖，造福黎元非淺鮮也。……臺南輸出品物，以砂糖為大宗，米次之，苧麻、菁子、姜黃等亦不一而足，二百年來，未曉改良新法，果能切實講求，必有進步，不致日就衰替。……自茲以往，敢不竭力考究，凡栽培灌溉之法，日新不已，以仰負列憲裁成至意，庶幾利途日啓，智識日開，殖產興盛，比隆內地，豈不懿歟！」<sup>(26)</sup>

這次品評會還有另一項值得注意之事，即將參加的農產品，按照當時新式的農學概念，將之分為普通農產物、特有農產物、農產製造品、蔬菜、草木、家畜家禽及水產等七部，另設參考品，做為比較參考之用。<sup>(27)</sup>

(21) 稻垣其外監修，北川洗耳編纂，《臺灣大年表》（臺北：臺灣經世新報社編輯局，1932），頁 29。

(22) 《臺灣日日新報》，第 131 號（明治 31 年〔1899〕1 月 18 日），漢 3 版。

(23) 《臺灣日日新報》，第 260 號（明治 32 年〔1900〕3 月 17 日），漢 3 版。

(24) 不著撰人，《明治 32 年臺南縣農產物品評會報告》，頁 23-26。

(25) 臺灣人中唯一出任審查官者為擔任臺南縣屬的林觀吾，而被臺南縣選為審查員的臺灣人中，不乏當地著名的士紳，如王雪農、楊聯登、翁煌南等。不著撰人，《明治 32 年臺南縣農產物品評會報告》，頁 36。

(26) 同上註，頁 39。

(27) 同上註，頁 11-13。



就日本殖民統治的角度來看，一八九九年的農產物品評會對於根植殖民政府農經調查的工作也有其重要意義，因為有名的「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以及農會系統，都是在四年之後（1903）才開始運作，<sup>(28)</sup>因此農產品評會等於是為日後舊慣調查工作以及農會組織奠立了先期性的基礎工作。

有了臺南縣物產品評會的經驗後，基隆、臺北、新竹、臺中、彰化等縣也紛紛效法，<sup>(29)</sup>其中臺北縣更為了配合明治三十六年大阪內國勸業博覽會而舉行了「臺北縣物產品評會」，先期進行物品調查與收集之工作。<sup>(30)</sup>臺北縣的物產品評會在規模上比臺南更大，一共有兩千餘名參展者，展出物品 4,954 件，其中米與茶就佔了一半以上。經過審查後被推薦的物品才有資格送至大阪參加展覽。這種專為日本國內博覽會舉辦的品評會，正好說明了品評會功能的擴大與轉變，亦即品評會不僅具有調查、審核、制定臺灣農業生產內容與目標的功能，還成為大型博覽會徵集、動員物資的初階準備作業。

農產品評會能夠在各地推行，意味著殖民政府在地方上對於物產動員能力的延伸，而使這種動員能力得以伸展的制度，就是保甲組織與農會。日治時期保甲組織乃承襲清代的傳統，總督府於一八九八年八月三十一日頒佈「保甲條例」及「保甲條例施行規則」做為地方基層治安的組織，至明治三十四年（1901）時，奉命擔任保甲局長及保正的臺灣人計有 3,259 人。保甲組織原本以維持地方治安為主要任務，但是日後凡與地方上殖產興業及教育衛生事務的推動，都由保甲系統擔任最底層的執行單位，農產品評會正是其中一項必須執行的任務。從近年出版的《水竹居主人日記》中，我們可以看到保正在地方上做為動員物產以參加品評會的角色。日記的主人張麗俊從一八九九年至一九一八年為止，連續二十年在豐

(28) 明治 34 年 10 月 25 日總督府以敕令第 196 號發布「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規則」，在調查會中設立第二部，負責調查有關農工商經濟等相關事務，然第二部的工作要等到明治 36 之後才開始正式運作。見持地六三郎，〈敘言〉，《臨時臺灣舊慣調查第二部調查經濟資料報告》（臺北：文叢圖書公司據明治 38 年版影印，1979），頁 1-2

(29) 基隆於明治 33 年 12 月 7 日由基隆辦務署主辦，《臺灣日日新報》，第 783 號（明治 33 年 12 月 8 日），漢 3 版；新竹則於明治 33 年 12 月 3 日舉行，《臺灣日日新報》，第 783 號（明治 33 年 12 月 8 日），漢 3 版。臺北縣於明治 34 年 10 月 21-11 月 4 日舉行，《臺灣日日新報》，第 1045 號（明治 34 年 10 月 25 日），漢 3 版；臺中縣見《臺灣日日新報》，第 1367 號（明治 35 年 11 月 21 日），漢 3 版；彰化縣於明治 35 年 12 月 5-15 日舉行產品評會，見《臺灣日日新報》，第 1363 號（明治 35 年 11 月 16 日），漢 3 版。

(30) 《臺灣日日新報》，第 604 號（明治 33 年 5 月 9 日），漢 3 版。

原下南坑第一保擔任保正，張麗俊的日記則始於一九〇六年。豐原一帶在日治初期被選定為栽植黃麻的地區，一九〇六年二月，張麗俊即被要求要對保內每甲田地可以配種多少黃麻進行調查。<sup>(31)</sup>七月三日他調查保內黃麻「何人最高大茂盛，要錄名報告，以定後日品評會」。<sup>(32)</sup>四天之後，他向街役場報告了保內種黃麻額數，另選出 21 名報告要出品者。八月四、六兩天他先在保內審查黃麻，然後在八月十日才帶領出品者至豐原（時稱葫蘆墩）役場正式品評。<sup>(33)</sup>除了種植黃麻之外，保正還要協助地方政府調查保內土地利用方式、地租水準、推動種植樟腦、「共同秧苗」制度及度量衡標準化等工作，是以張麗俊在日記中抱怨保正工作「法網愈密，規約愈加，事無大小，屬保正之責者，難以枚舉……」<sup>(34)</sup>從張氏的日記裏，我們可以看到保甲制度在動員地方人力物資上所產生的作用，透過保甲制度，日後殖民政府才能動員物資至日本，向日人展現其在臺灣統治的「績效」。

從一九〇三年以後，農產品評會就成為地方上農業生產的重要活動，隨著日本對臺灣農業政策的細緻化及專業化，各地逐漸形成專業的生產區，農產品評會也就逐漸分化為各種專門的品評會，如臺北地區的茶葉品評會、新竹地區的柑橘品評會、中部地區的水稻競作會、南部地區的甘蔗品評會等等。藉著這些品評會，傳遞了日本對於農業生產規格化與標準化的要求。以稻作為例，日治時期臺灣稻作事業最重要的方向，就是要使得不適應日本風土及飲食習慣的稻種，改變為符合日本標準的稻種，蓬萊米種的出現正是因應這種需求而有的研發結果。在「標準版」的蓬萊米尚未問世之前，殖民政府就是透過水稻品種的馴化與集中，以達到稻米的規格化，進一步為稻米商品化建立基礎。<sup>(35)</sup>從前述臺南農產品評會中審查官的主要意見中我們可以發現這種希望將臺灣稻種「規格化」的意圖。地方農產品評會雖然不是推動、執行稻種改變的技術研發與執行單位，但卻是宣示這種「標準化」規格與價值的重要場所。

(31)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編纂解說，《水竹居主人日記(-)》（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頁 13。

(32) 同上註，頁 84。

(33) 同上註，頁 84-100。

(34) 同上註，頁 14。

(35) 川野重任著，林英彥譯，《日據時代臺灣米穀經濟論》（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研究叢刊第 102 種，1969），頁 29-34。

從前面的討論我們可以勾勒出一個日治初期展示活動的基本輪廓，明治維新後，日本即已利用各種展覽活動達到收集產業情報、生產技術標準化及宣揚文明開化以使日人認同現代性價值等目標。統治臺灣後，藉著舉辦物產品評會以及舊慣調查會的工作，日人掌握了臺灣土地人口產業的基本面貌，而總督府以及在臺日人也是憑著對於這個基本面貌的認識，在大阪博覽會中將臺灣呈顯在日本及國際人士之前。那麼，在大阪博覽會所呈顯的臺灣，又是何種面貌？

## 四、大阪博覽會

一八七七年日本舉辦第一次的「內國勸業博覽會」之後，大體上形成了每五至十年舉辦一次這種類型博覽會的慣例，一九〇三年如前例在大阪舉行了「第五回內國勸業博覽會」。舉辦這次博覽會雖是一種慣例，但是大阪博覽會的展覽型態與性質卻與前面四次有許多不相同之處。首先，大阪博覽會舉辦的目的，是希望「誘發產業起飛」的「經濟博覽會」，因此在會場中特別設立了「參考館」，招納世界各國器物參展，以他山之石刺激日本國內產業。在這個目標下，過去博覽會中經常以炫奇新鮮為號召的展示品大多被排除在展示之列。<sup>(36)</sup>換言之，前四次勸業博講求殖產興業中的各種技術及情報的收集與交流的傳統，在大阪博中仍然延續下來。不過，儘管此次博覽會刻意擺脫炫奇鬥新的展示，但在大阪博開會之時，日本仍然籠罩在甲午戰爭與義和團事變勝利的氣氛之中，這兩場戰役讓日本人相信，自己已躋身於世界列強之林，因此如何展現這個亞洲帝國的榮光，是大阪博覽會與前四次勸業博展示設計截然不同的思考重點，誇耀富庶與強盛於是成了這場博覽會的特色之一。與在京都舉辦的「第四回內國勸業博覽會」相較，大阪博的會場面積足足大了 2.3 倍（為 114,017 坪），陳列館則由 6 館擴增為 14 館，<sup>(37)</sup>參展品數因此多了 1.6 倍（為 276,719 件），觀眾人數也比前次多了 4.7 倍（達到 5,305,209 人次）。<sup>(38)</sup>除了數字堆疊出龐大富裕的景象之外，實體的展示也得呈顯

(36) 芳井敬郎，〈第五回內國勸業博のディスプレイ〉，收於吉田光邦編，《萬國博覽會の研究》，頁 290、304。

(37) 第四回內國勸業博共有工業、美術、農林、動物、水產和機械等六館，大阪博則將農林一分為農業、林業二館，另新增教育、通運、水族、臺灣和參館等館以及溫室和冷藏庫等設施。

(38) 芳井敬郎，〈第五回內國勸業博のディスプレイ〉，頁 288-289。

日本這個新進帝國主義國家的特色，呈顯的方法之一，就是仿效法國一八六七年巴黎博覽會的做法，<sup>(39)</sup> 將世界「落後民族」集結展示，於是而有教育學術館內展出北海道愛奴人、臺灣生番、琉球、中國、印度、爪哇、土耳其和非洲土著等 32 名的安排。<sup>(40)</sup> 然而，真正能突顯日本帝國榮光的，應該是將它的新領土——臺灣——和日本在這塊領土上的統治成效呈現在大眾眼前，一方面滿足了日本成為帝國的願望，另一方面則可化解日本國內政界對臺灣總督權力過大的疑慮。<sup>(41)</sup> 臺灣館的建設，正是凸顯帝國榮光的地標。在我們進入臺灣館前，先簡單介紹整個大阪博的會場配置，以明瞭臺灣館在會場中的相關位置。

位於大阪市天王寺的博覽會會場，<sup>(42)</sup> 進入正門前有假山涼亭和青龍噴泉等造景（參見附圖一），通過正門後可見連通會場的大道，在大道中心點上並置有噴泉一座，大道的左邊是工業館、教育館及後排的電氣館、商標館和飲食店；右側則依序為農業、水產、林業、動物等主題館；過了大道中央噴泉後的右邊列有通運、機械和參考等館，走過參考館後步上緩緩斜坡，通過第二個噴泉後則可見到美術館和兩旁的飲食店（附圖二），最後到達會場的底端，在那兒矗立著臺灣館和體育館，另有高塔和肖像館等兩項娛樂設施。此外，在尚未進入主門前，左側空地則安排了 46 都府市縣的地方館，陳列地方特色及物產。（參見地圖一及附圖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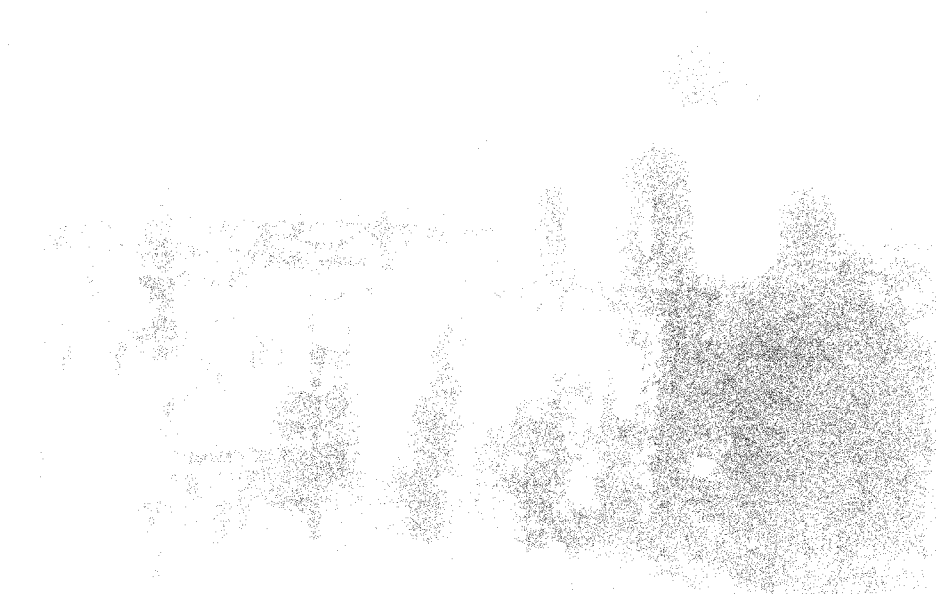
如果面積大小可以表現博覽會展示的重心所在，則工業館、農林館、機械館和參考館無疑是展示的核心，佔地面積居各館之次的臺灣館更是大會安排的焦點。從安排的參觀動線也可以看出，大會希望觀眾能先觀看工業館和電氣館，以明瞭明治維新後日本邁向先進國家之途的奠基在於工業、機械和交通與教育，然

(39) 萬國博覽會首度出現人種展示，是 1867 年巴黎萬國博覽會中展示中國的巨人與侏儒。其後截至 1986 年為止，在 57 次的萬國博覽會中，共有 67 處殖民地的人民被動員放置在博覽會中供人觀賞。有關人種展示與博覽會、殖民權力關係的討論，參見 Burton Benedict, "Rituals of Representation: Ethnic Stereotypes and Colonized Peoples at World's Fairs," in Robert W. Rydell and Nancy E. Gwinn eds., *Fair Representations: World's Fairs and the Modern World* (Amsterdam: VU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28-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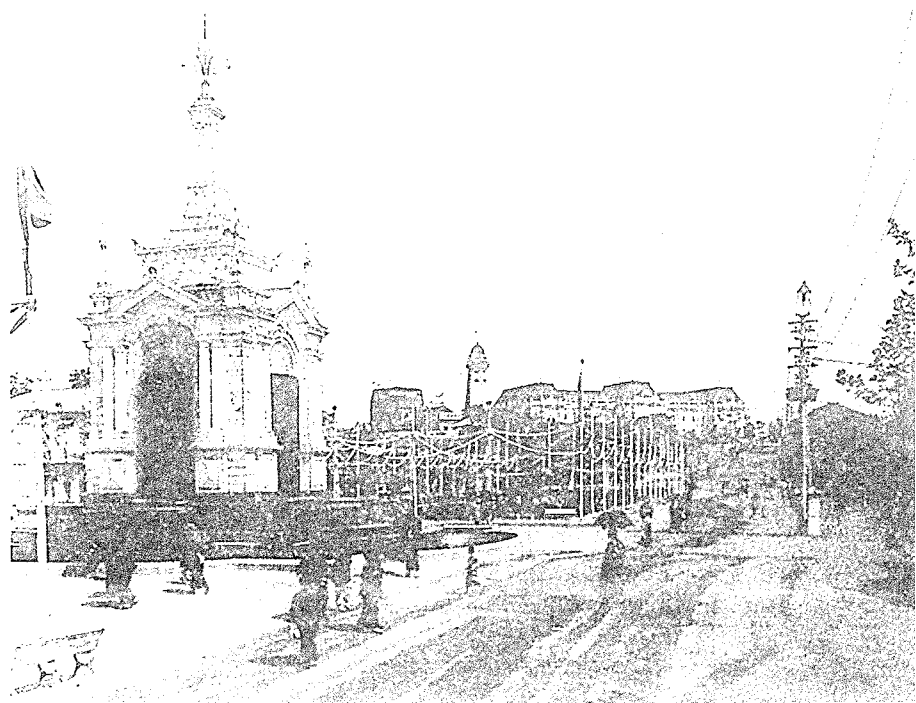
(40) 吉見俊哉，《博覽會の政治學》，頁 213。

(41) 就在大阪博覽會舉辦的前一年，在臺日本人聯合日本國會議員針對六三法賦予總督過大權限的問題提出質疑，希望廢除六三法。有關此一問題的本質及其最後結果，參見吳密察，〈明治三五年日本中央政界的「臺灣問題」〉，收於氏著，《臺灣近代史研究》（臺北：稻鄉出版社，1991），頁 109-1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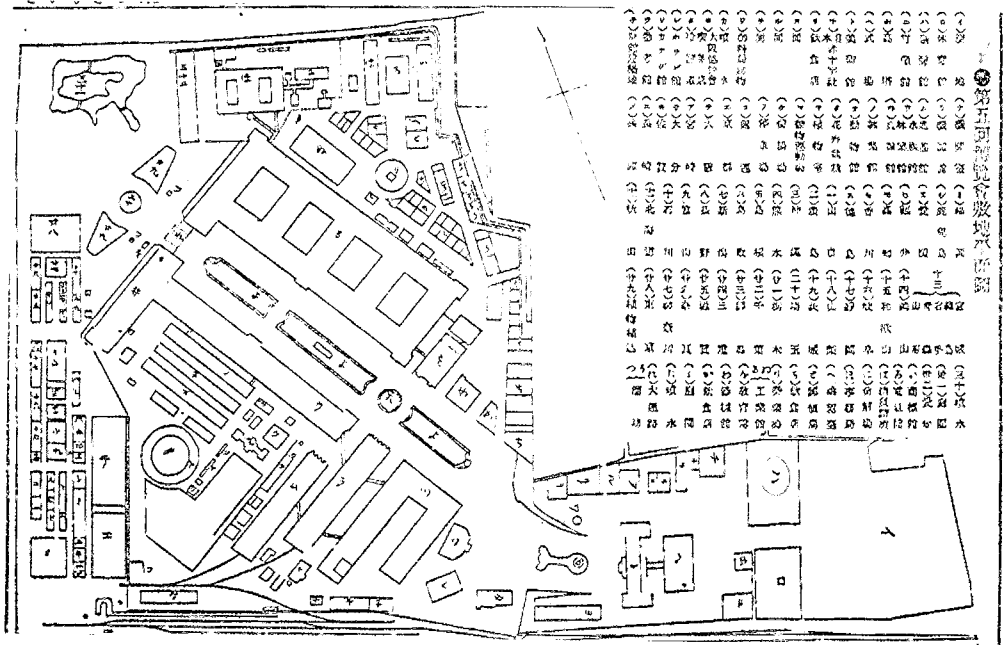
(42) 第五回內國勸業博覽會結束後，原會址闢建為天王寺公園和動物園（1915 年設立），美術館的建築亦保留下來，成為今日大阪市立美術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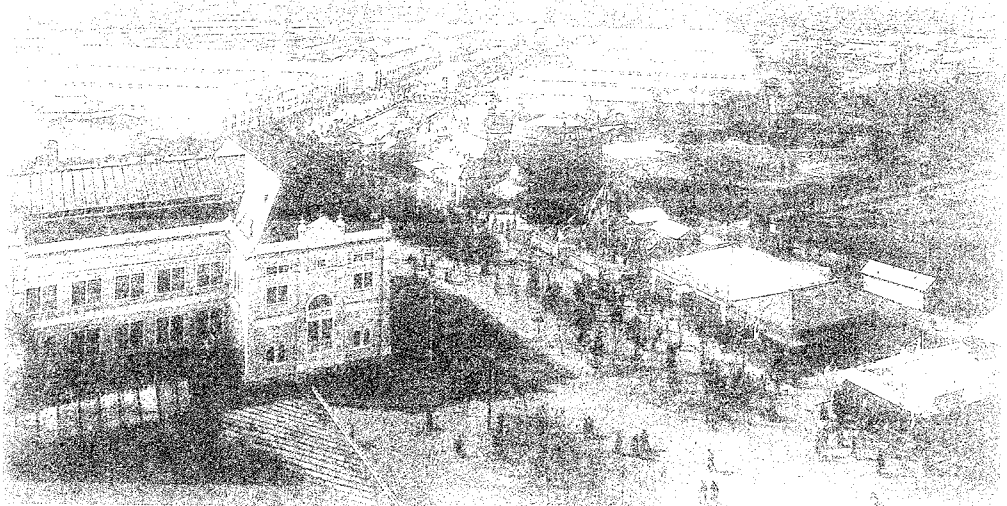
附圖一 大阪博覽會正門前的廣場與青龍噴泉（東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



附圖二 由中央大道噴泉塔望山丘上的美術館及高塔（東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



地圖一 大阪博覽會會場平面圖 (《臺灣日日新報》，1903年3月1日。)



附圖三 由臺灣館前之高塔鳥瞰大阪博覽會場，臺灣館無法納入畫面 (東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

表 1 各主題館的面積

館 別	面積(坪)	館 別	面積(坪)	館 別	面積(坪)
工業館	5,095	農林館	1,465	機械館	1,458
參考館	1,458	運通館	900	動物館	859
水族館	807	美術館	558	教育館	309
臺灣館	1,604				

資料來源：《臺灣日日新報》，明治 36 年（1903）3 月 1 日，第 1 版；月出皓編，《臺灣館》（臺北：第五回內國勸業博覽會臺灣協贊會，1903），頁 8。

後越過中央大道進入農林漁牧各館，以表明農業立國的根本；看完本國發展狀況之後，再進入參考館以認識他山之石，<sup>(43)</sup>最後，明治維新所欲追求和所欲達到的境地則是「文明開化」，而最能體現開化之象的，莫過於能表現日本藝術與文化精神的美術館和能表現強健體魄之國民體格的體育館。文明開化不僅光被日本，更籠罩他的第一個殖民地——臺灣，因此臺灣館是整個參觀動線的終點，也是壓軸大戲之所。<sup>(44)</sup>

這個預定的動線並不只是紙上談兵的設計，在官式安排的參訪活動中，我們可以看到受邀者在安排的路線上，按圖索驥，亦步亦趨行進的情況。例如被人稱為中國第一部女子出國遊記《癸卯旅行記》的作者錢單士厘，她於一八九九年隨夫錢恂留日後，即滯居東京。一九〇三年三月十五日，錢恂受日本政府之邀參觀博覽會，單士厘乃同其夫婿一同遊歷大阪。<sup>(45)</sup>她在三月十六至十七兩日遊觀博覽會，並且詳細地記錄了她所參觀過的主題館，首先就是「工藝館，為此會主中之主，棟宇連垣，品物充軻，較他館為盛」，然後她依序介紹了教育、農業、林業、

(43) 《臺灣日日新報》，第 1447 號（明治 36 年 3 月 1 日），第 5 版。

(44) 此次大阪博覽會在許多方面模仿 1893 年巴黎萬國博覽會的設計，包括主門前的廣場、噴泉；主門的拱門造型、入門後以中央大道分隔左右兩展區，以及大道尾端的緩升坡地和在坡地上興建美術館等等，均為模仿巴黎萬國博覽會之作。見〈外人の眼に映じたる大阪博覽會(二)〉，《臺灣日日新報》，第 1543 號（明治 36 年 6 月 24 日），第 1 版。

(45) 單士厘（1856-1943），浙江省蕭山縣人，29 歲方與錢恂結婚。1899 年因錢恂奉湖北省之命率留學生赴日，單士厘乃隨夫移居日本。1903 年 4-6 月，又隨夫行經西伯利亞大鐵道而抵莫斯科，她將此行見聞寫成《癸卯旅行記》一書。1907-1908 年，錢恂奉清朝之命為荷蘭與意大利公使，單士厘乃遊歷歐洲大陸，寫成《歸潛記》一書。單氏乃清末中國極少數有機會周遊世界且有文字將遊歷經過傳世之女子。參見鍾叔河，〈第一部女子出國記〉，收於氏主編，《走向世界叢書》（湖南：岳麓書社，1985），頁 658-662。

水產、機械、通運、美術等館，最後到達臺灣館。由於水族館並不在會區，因而參觀水族館的活動在三月十九日才成行。<sup>(46)</sup> 單士厘的記述應該可以代表那些依照大會安排而參觀的情況，不過，對照後面的討論，我們即會發現，被邀請參觀大阪博覽會的臺灣士紳，卻有不太相同的參觀動線。不過，在比對其中異同之前，讓我們先進入臺灣館，一窺內部的堂奧。

## 五、臺灣館的籌建

臺灣館的設立主要是由日本政府策畫，臺灣總督府執行的展覽場。當時一般人仍然認為臺灣是佈滿食人野番之族棲息之地，因此希望藉著這個主題館讓一般日本人民能夠了解這個新附日本領土的面貌，以及日本在統治臺灣八年之後的建設成果。<sup>(47)</sup>

整個臺灣館共佔地 1,604.39 坪，整個空間是混合著傳統城池方形結構與民宅四合院式的封閉空間。正門造型採臺北府城門樓，門外還立有旗竿和兩座蹲踞的石獅（附圖四）。除了門樓為主門外，在東側還有一座轅門做為第二出入口（附圖五）。進入門樓後東側篤慶堂、西側各設陳列所和仿造篤慶堂的建築（附圖六）是臺灣館內的兩座主要展示場，而以仿造臺灣特有騎樓建築的廊道相銜，廊道本身亦陳列許多物品。北側是附設的喫茶店、賣店和「臺灣料理店」等三項商業設施（附圖七）。四合院所圍成的中庭則有一座「舞樂堂」（附圖八），乃清末布政使司衙門內的戲臺拆遷而來。另外在西北角則造有假山，上有「雨傘亭」一座，乃新竹鄭用錫北郭園內之物。西南角則種植芭蕉、椰子、相思樹、檳榔等臺灣特有植物和彌猴、山羌、花鹿、穿山甲等臺灣特有動物，主展場「篤慶堂」原為臺南劉氏宗祠，一八九五年日本領有臺灣時，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曾駐紮於該處，其後被官方收購。<sup>(48)</sup> 同時更在喫茶店、賣店和臺灣料理店裏雇請臺灣少女為招待。<sup>(49)</sup> 整座四合院式的臺灣館，其實就是要塑造出一個能夠讓日本人理解（想像）的模

(46) 錢單士厘，《癸卯旅行記》，收於鍾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頁 685-692。

(47) 月出皓編，《臺灣館》（臺北：第五回內國勸業博覽會臺灣協贊會，1903），頁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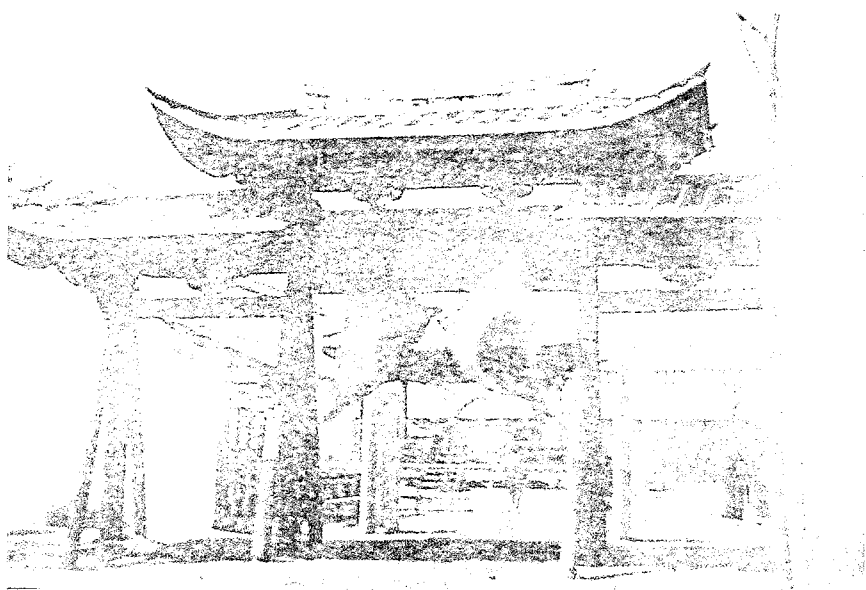
(48) 同上註，頁 2-4。

(49) 同上註，頁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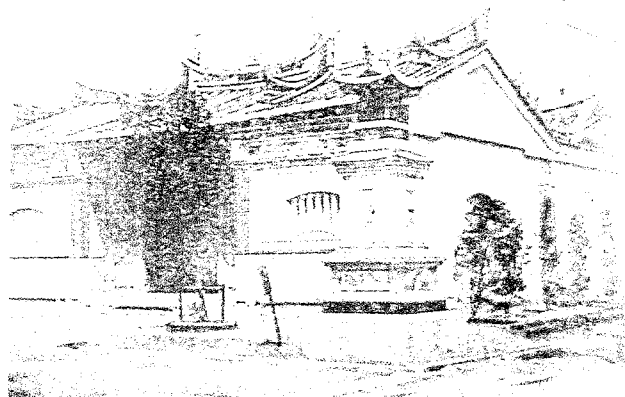




附圖四 臺灣館正面入口前之廣場、門樓及插有五色旗幟的旗竿  
(東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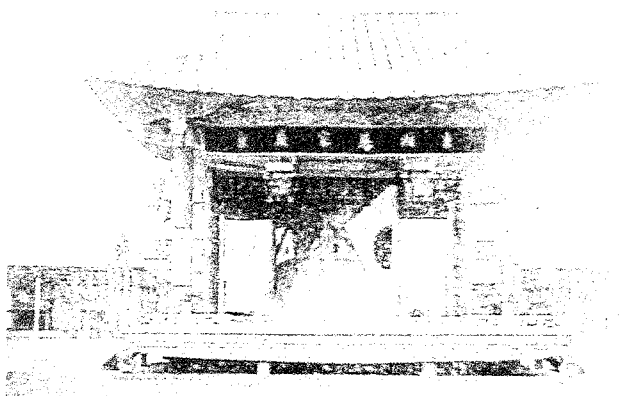
附圖五 臺灣館東側出入口之轅門 (月出皓編,《臺灣館》,頁 10 插圖。)



附圖六  
篤慶堂外觀，正門右側外  
另立有惜字亭（月出皓編，  
《臺灣館》，頁10插圖。）



附圖七  
臺灣館內的喫茶店、料理  
店和共同賣店外觀（月出  
皓編，《臺灣館》，頁10  
插圖。）



附圖八  
舞樂堂（月出皓編，《臺灣  
館》，頁10插圖。）

擬臺灣，「諸凡屋宇以及庭園結構體裁，一切純然仿臺灣景象，令人觀之，有別一乾坤之思」。<sup>(50)</sup>

表 2 臺灣館各建築面積

建築名稱	面積(坪)	建築名稱	面積(坪)	建築名稱	面積(坪)
總面積	1604.39	主要建築面積	529.51		
各類陳列館	150.00	篤慶堂	88.59	共同賣店	78.43
篤慶堂型陳列場	56.00	臺灣料理店	45.66	喫茶店	38.00
左右兩廊	37.50	樓門	20.00	舞樂堂	15.33

資料來源：月出皓編，《臺灣館》，頁 8。

在這個模擬複製的空間裏，篤慶堂主要陳列總督府各單位所提供的展品共 1910 件，「各類陳列館」則展示各地方縣廳評比收集而來的民間各種產物共 4,032 件。篤慶堂裏提供了「巨視」與「微觀」兩種呈顯臺灣的視角。進入樓門後右側擺置臺灣漢人衣著服裝的標本和臺灣地理歷史的解說，在文字的導引下，再觀看臺灣島的模型和土地調查局所測繪的各種地圖和地籍圖，看完巨視鳥瞰的臺灣後，再由微觀角度來「認識」臺灣，因而接下來的空間，分別是臺灣漢人廳堂寢室空間的展示（附圖九），以及各種日常生活風俗習慣的解說，另以圖片方式特別強調剃頭店、養鴨和織布等景。<sup>(51)</sup>爲了能對臺灣漢人容貌有更進一層的認識，主辦單位還延聘了東京美術學校的安木龜八塑成八尊與真人等高、身著不同服裝的漢人臘像，「其容貌衣服，殆不辨真假，躍然欲動」<sup>(52)</sup>（附圖十），這八尊臘像就成爲參觀篤慶堂的最高潮。門樓左側廊道主要展示臺灣原住民族，依序是各族食衣住行的照片簡介以及武器，另有日常生活器物和工藝品的陳設展示。左側廊道銜接仿篤慶堂的展場，在此展場內主要陳列總督府專賣局的出品，如鹽田模型與製造說明、樟腦製造工序說明和一座樟腦製成的八尺高惜字亭，另一展品則爲臺灣各監獄犯人的手工藝品。結束此區的觀覽，接續而來的則是進入左側「各類陳列館」，裏面陳列了農業、林業、水產和工業四部的展品，依序陳列米豆花生、蔬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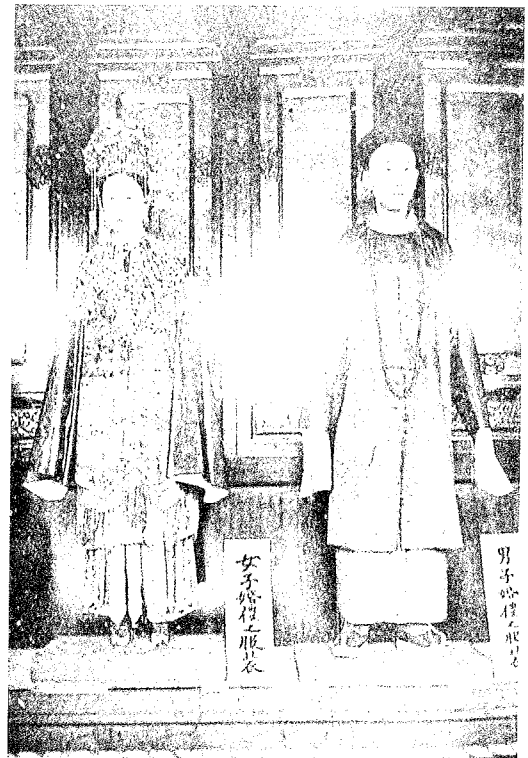
(50) 《臺灣日日新報》，第 1449 號（明治 36 年 3 月 4 日），漢 3 版。

(51) 月出皓，《臺灣館》，頁 90。

(52) 《臺灣日日新報》，第 1447 號（明治 36 年 3 月 1 日），漢 5 版。



附圖九 篤慶堂內模擬漢人家庭廳堂寢室之陳設（月出皓，《臺灣館》，頁44。）



附圖十 篤慶堂內著常裝和婚禮服之男女臘像（月出皓，《臺灣館》，頁46。）

果物、泥藍姜黃煙草和纖維製品、茶糖等植物和農具的標本；油紙、酒、家具等手工業產品的標本。認識了臺灣既有農工產物之後，殖民統治成功與否最重要的指標之一即是教育，因此整個臺灣館參觀動線的終點就是將傳統漢人書房教育的書籍和日治之後公學校教育的內容一併陳列，以明殖民政府對於臺灣「同化」政策的執行情況。<sup>(53)</sup> 館內陳設的空間配置請參考地圖二、三。

大阪博覽會開幕後，臺灣館無疑是眾人焦點之一，除了明治皇帝、皇后和太子分別於五月一、三、二十八三日來館各參觀了一個多小時，並且購買了數十箱的烏龍茶、包種茶和大甲蓆、大甲帽等「特產」外，<sup>(54)</sup> 遊觀者對於館內的喫茶店、賣店和臺菜館都充滿了好奇，以至於五個月的展期間，到喫茶店來品茶購茶的人數就達 96,202 人，湧進臺菜館的遊客也有將近三萬八九千人，臺灣特產的大甲蓆、大甲帽、林投帽和樟腦、鳳梨罐頭、龍眼乾等特產之名更是不遜而走，總督府原本預估共同賣店的營業額只有五千圓左右，但實際上卻達兩萬圓的收入，<sup>(55)</sup> 可以見得在臺灣館內「異國情調」(exoticism) 對於商品銷路的影響。

不過，特產買賣只是吸引觀眾的手段，而非建設臺灣館的主要目的。做為第一次將第一個殖民地放入「內國勸業」博覽會來展示，臺灣館的政治展示目的絕對強過其他較偏向產業經濟的主題館。明治皇帝雖然在位時使得日本躍入世界帝國主義國家之林，但他一生從未踏上任何殖民地的土地，唯一一次與臺灣最接近的時刻，就是五月一日到模寫複製的臺灣館觀看的經驗。各種地圖、照片、圖表和解說；各種地理模型和人偶臘像都在那兒靜靜地供他觀賞凝視。就在大阪博覽會舉辦的前一年，在臺日本人聯合帝國議會議員發動了撤廢六三法的運動，希望限制總督的權力以實現以日本人為臺灣主體的想法，更要求總督府應禁止臺人的「不良習俗」。<sup>(56)</sup> 現實政治環境中臺灣總督與日本國會間的權力衝突，就在這場巡視中象徵性地化解，臺灣在明治皇帝的巡視中象徵性地納入到帝國的版圖裏。具有同樣象徵意義的舉動，則是東宮太子在五月二十八日到臺灣館時，對於臺灣島的地理模型觀看良久，因此後來總督府即將這個模型獻給東宮太子。<sup>(57)</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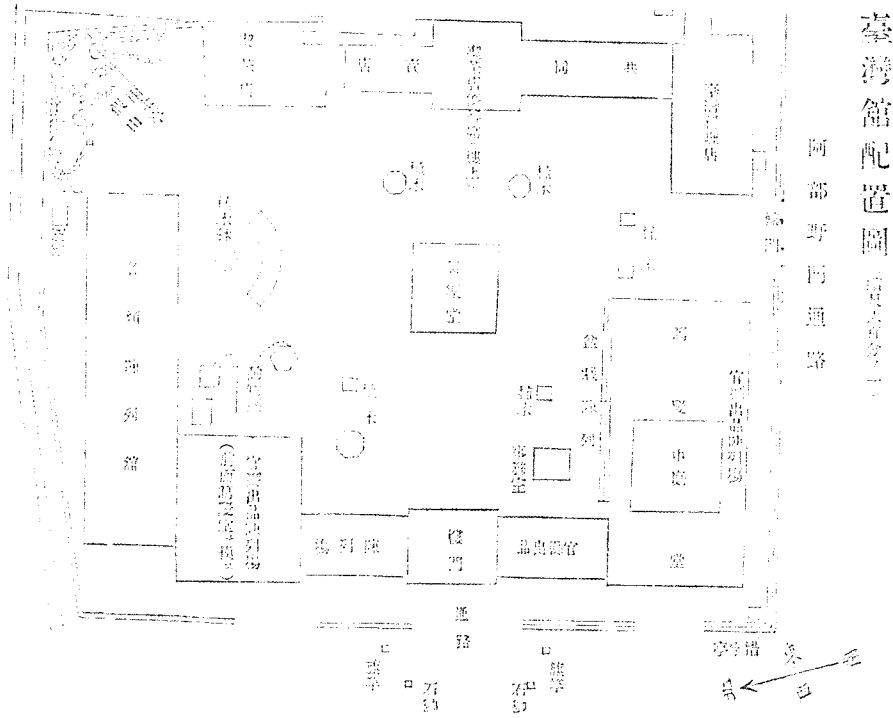
(53) 月出皓，《臺灣館》，頁 81-140。

(54) 同上註，頁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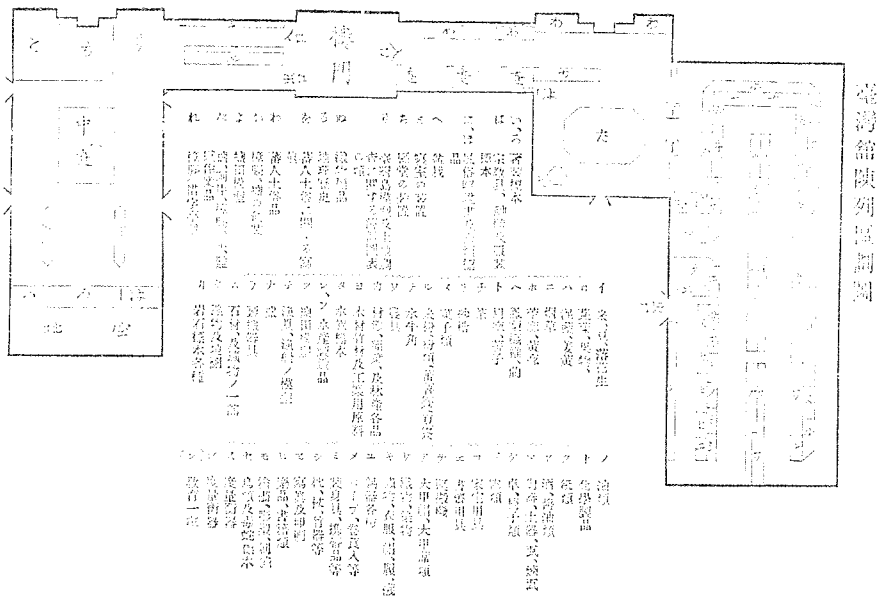
(55) 同上註，頁 11-14。

(56) 吳密察，〈明治三五年日本中央政界的「臺灣問題」〉，頁 109-148。

(57) 〈獻納臺地模型〉，《臺灣日日新報》，第 1580 號（明治 36 年 8 月 6 日），第 3 版。



地圖二 臺灣館展示平面圖 (資料來源：月出皓，《臺灣館》，頁8。)



地圖三 臺灣館內展品陳設配置圖 (資料來源：月出皓，《臺灣館》，頁81。)

然而，這種提供統治者凝視監看的展示內容，一般觀眾又從何種角度來觀看理解？臺灣館模寫複製的臺灣提供給觀者何種臺灣的形象？臺灣館裏的各種陳設能否達到總督府宣傳在臺治績的目標？

錢單士厘在看過臺灣館後有如下的記述：

凡臺灣物產、工作皆列焉。觀其六、七年來工作，與夫十年前之工作相較，其進步之速，令人驚訝不已。昔何拙，今何巧，夫事在人為耳。草席、樟腦、蔗糖、海鹽，尤今勝於昔。且新發明之有用物品，多為十年前人所不及知者。再越二三十年，必為日本一大富源。(58)

單士厘筆下「昔何拙，今何巧」神速進步的稱讚，似乎可以感覺到觀者認同了總督府在臺建設（工作）的成功，甚且也認同了這塊土地已屬日本所有，因為「越二三十年後，必為『日本』一大富源」。

與錢單士厘相仿的言論，還可以在《臺灣日日新報》記者對於臺灣館的一段描述：

比起博覽會中其他各館宏壯華麗的建築、驚奇眩目的展品相比，偏促一隅的臺灣館不論就位置或者內部設備而言，似乎都顯得相形見绌。然而一般人仍然爭相目睹且讚不絕口，何以致之？實乃臺灣館為母國人絕佳之戰捷紀念也，而丹碧色的樓門堂宇、漢番風俗、亞熱帶草木鳥獸和一切奇珍產物，都是使得人們讚賞不已之處，臺灣館因而成為本次博覽會中必先一睹的景勝。(59)

不過，實際策展人卻與一般觀者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例如伊能嘉矩就對於以篤慶堂做為臺灣家屋建築的代表深不以為然，他認為若真要反應臺灣一般建築的特色，則篤慶堂只是某一私人之宗祠，既不能稱為一般宗祠的典型，更不足以代表臺灣一般家屋之建築，也正因為選了篤慶堂這樣的宗祠建築做為展場，使得館內介紹臺灣家屋內部空間配置的展示和既有的祠堂空間顯得格格不入。伊能對於

---

(58) 錢單士厘，《癸卯旅行記》，頁 688。

(59) 木村地夫，〈博覽瞥見記(五)：臺灣館〉，《臺灣日日新報》，第 1478 號（明治 36 年 3 月 11 日），第 1 版。

總督府只考慮這棟建築過去曾是北白川宮使用過且已被官方徵收，可以節省經費而便宜行事的做法不表苟同，直言這是臺灣館設計中的一大敗筆。<sup>(60)</sup>其次，他耿耿於懷的第二個問題是，原本在篤慶堂的展示中特別列有吸食鴉片、女子纏足和乩童信仰等風俗照片和介紹，而且在月出皓印製的《臺灣館》一書中還特別在漢人風俗信仰的部分提到這些照片資料，<sup>(61)</sup>但在最後展出時，卻因總督府以為內容有損臺灣統治政績形象，被迫抽出不得展示。<sup>(62)</sup>

除了伊能嘉矩之外，日日新報亦有人以「北州生」為名，撰文批評臺灣館的展示設計讓一般日本觀眾只注意到喫茶店中的臺灣女侍、篤慶堂鮮艷耀眼的色彩和栩栩如生的臘像。有士紳在看完臺灣館後，仍以爲牆上掛的漢番風俗圖表現出臺灣多土匪與生番，對於館內足以表現臺灣各種風貌和日本建設統治的成果卻毫不注意，正顯示臺灣館的展示並沒有改變一般日本人對於殖民地臺灣的刻板印象。<sup>(63)</sup>

伊能與總督府立場的差異，一方面顯示總督府想要展現的臺灣，就是「昔拙今巧」突飛猛進的形象，以及能喚起觀者認同此乃日本領土的政治考量，因此即便與實際生活空間差異甚大的祠堂也能因著日本政治領袖居住過的象徵符號關係，而搖身一變成爲代表臺灣漢人家庭生活空間的範本。另一個重要意義在於，它顯示了臺灣館所欲呈顯的面貌，在主辦者與策展人之間存在著認知上的差異，臺灣館所呈顯的臺灣，是「合議」創造出的異質臺灣。然而，不論同質也好，異質也罷，觀眾總是用既有的習慣在觀看，因此，如北州生所言，具有教養的士紳在進入臺灣館後，所注意者唯有臘像與喫茶店，而對臺灣的認識仍然停留在土匪生番出沒的認知狀態，即便是明治皇帝，也不能不受到臘像的吸引而駐足良久。

(60) 梅陰子（伊能嘉矩），〈風俗上より見臺灣館(-)〉，《臺灣慣習記事》3:6（明治36年6月），頁76-83。

(61) 月出皓，《臺灣館》，頁90。

(62) 梅陰子（伊能嘉矩），〈風俗上より見臺灣館(-)〉，《臺灣慣習記事》3:6，頁76-83。大阪博覽會籌展期間，東京帝大理學部坪井正五郎原本有意將中國人和蝦夷、印度、朝鮮及南洋群島等人種置放於「人類館」中展示，其中中國人欲展出辮髮、纏足和吸鴉片等「風俗」，結果留日中國學生極為憤慨，向大會強力抗議，要求不得展示，是以人類館不敢展示華人，但還是找了一位住在臺北市北門街名為「李寶玉」的女子在該館展示纏足。見《江蘇》1（光緒29年4月），頁151-157。有關清廷在大阪博覽會中的參訪展示活動，參見呂紹理，〈從1903年大阪博覽會看臺灣與中國的呈顯〉，發表於香港浸會大學、清華大學主辦，「香港浸會—清華大學第四屆學術研討會：21世紀世界與中國—當代中國發展熱點問題」，2002年5月23-24日。

(63) 北州生，〈臺灣館の價値〉，《臺灣日日新報》，第1492號（1903年4月24日），第2版。



## 六、臺人的遊觀活動

爲了招徠臺人能踴躍赴日參加大阪博，籌備單位在臺灣協會大阪支部的贊助下，除了代辦發售至日本的船票車票之外，還在大阪建了一棟「臺灣會館」以供遊觀日本的臺人居住。會館內不但設有通譯二名，還特別從臺灣招募了兩名庖丁，以使館內「寢食諸事均與本島人風俗習慣飲食等期其適合。」<sup>(64)</sup>

凡參加大阪博的旅客，島內旅行的火車票價七折優待，渡日輪船票價也有八折的優惠。<sup>(65)</sup> 在總督府、各地方官廳及臺灣協會的大力招攬下，至明治三十六年(1903)二月底博覽會開幕前夕，共計有 1,001 人購買了觀覽折價券、1,156 人訂購了火車票，還有 2,300 人買了輪船票準備赴日。(參見表 3、4)

表 3 大阪博覽會臺灣各地購買觀覽折價券的數目

廳別	購買數	廳別	購買數	廳別	購買數	廳別	購買數	廳別	購買數
基隆	1	臺北	540	深坑	43	桃仔園	4	苗栗	76
臺中	—	彰化	38	南投	40	斗六	36	新營	10
臺南	176	阿猴	8	恒春	18	宜蘭	11	計	1,001

資料來源：《臺灣日日新報》，第 438 號（明治 36 年 2 月 19 日），日 2 版。

表 4 大阪博覽會臺灣各地購買火車輪船票數目

廳名	火車票	輪船票	廳名	火車票	輪船票	廳名	火車票	輪船票
基隆	53	106	臺北	599	1202	深坑	47	94
桃仔園	10	10	新竹	14	14	彰化	58	116
南投	44	88	斗六	78	156	臺南	192	384
阿猴	30	60	恒春	18	18	宜蘭	13	52
合計	1,156	2,300						

資料來源：《臺灣日日新報》，第 442 號（明治 36 年 2 月 22 日），漢 2 版。

(64) 《臺灣日日新報》，第 1441 號（明治 36 年 2 月 22 日），漢 5 版。

(65) 同上註。

不過，這為數以千計的臺人在登船赴日之前，還得先通過傳染病的檢查，在日本的參觀活動時，還得以團體行動為準，團體之領隊必須負責團員之健康，同時公醫也須免費為參觀者開立健康證明書。(66)

赴日觀看博覽會的臺灣團體，到達日本後，大抵都由臺灣協會大阪支部做為接待單位，並且透過協會的安排，參觀博覽會場以及到日本其他各地旅遊觀覽。大阪、京都、名古屋及東京等是四個重要的遊覽地，在大阪除了參觀博覽會之外，大阪市政府、三井綢緞布帛店、大阪紡紗公司以及大阪水源地等地是城市觀覽的重點。此外大阪當地的天狗卷煙草工場、王子製紙等民營工場也是另一個重頭戲。在東京則上野公園、淺草、日本國會、拜見首相及臺灣總督等等則是主要行程。京都則遊觀清水寺、金銀閣寺、西陣織會所等地。

那麼臺人對於這些地點的觀看心得是什麼？

先就博覽會場內而言，策劃臺灣館的舊慣調查會及總督府的主辦單位認為臺灣館「一切純然仿臺灣景象，令人觀之，有別一乾坤之思」，回東京探親的總督府官吏村上則認為：

全體博覽會，有大規模之勸業工場，實為匯集精粹者也。而這次已為第五次，世人不太為珍奇。當此際，僅能使感到珍異者，蓋為臺灣館也。故博覽會之風聲爰部分集於臺灣館，而臺灣館之風聲又集在慣習研究所所提供展示之居民偶人。(67)

桃仔園廳第一區街長蔡路似乎有與日人相似的印象：「場所棟梁一切，仿照臺灣舊式，凡臺島所有貨物，莫不搜羅盡致，陳列整齊，來觀者踵接肩摩，竊謂我島出品，不居人下。」(68) 桃仔園的黃純青也仔細地臚列了臺灣館內的陳設，並且評論說「凡有關臺灣風俗習慣者，或繪成圖畫，或彫作型，無不備置於其間。」(69)

(66) 《臺灣日日新報》，第 1436 號（明治 36 年 2 月 17 日），漢 3 版。

(67) 〈大阪博覽會對本會展示品之評論〉，《臺灣慣習記事》3: 4（明治 36 年 4 月），頁 213-215。

(68) 蔡路，〈觀光有感〉，《臺灣日日新報》，第 1522 號（明治 36 年 5 月 29 日），漢 4 版。

(69) 黃純青，〈觀光記事（續前）〉，《臺灣日日新報》，第 1497 號（明治 36 年 4 月 30 日），漢 4 版。黃純青在同一篇文章裏，對於教育、工業館，只說「品物極其完備，手工極其精細，至若妙處有石可以言傳者。」而對臺灣館則詳列內部「臺灣料理店、喫茶店、共同賣店、臺灣產物陳列場及生蕃產物陳列場」，兩相對照，似可見黃氏因為對臺灣館內的陳設較為熟悉，因此也較具描述能力。

不過，同樣來自桃園的桃仔園廳參事呂鷹揚（呂氏的兒子即是有名的藝術家呂鐵州），卻只說臺灣館「亦是新鮮可愛，然未為希奇也」<sup>(70)</sup>，他對於會場大門前價值一萬三千圓的青銅九龍噴水池和動物園的興趣似乎遠較展示他故鄉的臺灣館來得更高。

除了臺灣館之外，臺人對於其他各館的印象如何？我們還是先舉呂鷹揚的陳述為例來說明。呂氏在三月二十一、二十三、二十五三天觀看了博覽會中的主題館。他對工業館的描述是「諸物品整理完備，妙處不可以言傳者」；而與臺灣相關的農業館，則是「凡關農產者無不備陳於其間，然皆良美之品，非尋常所能齊驅並駕也」。總體而言，他對大阪博覽會內部各館的總評語是「謂之美術，則無美不臻，謂之教育，則無教不備，謂之林業、農業工業、機械，則又盡窮地利而巧奪天工焉，其美可勝言哉！」<sup>(71)</sup>除了這些難以言喻的工業館、機械館之外，大部分的觀覽者在報紙中花了不少篇幅介紹「不思議館」裏種種不可思議的視覺幻象；他們也被水族館以及動物館裏的珍禽異獸所吸引。

呂鷹揚對於博覽會場內各館的陳設項目多半只能用「妙處不可以言傳者」的語句，其實也是絕大多數臺灣觀覽者於整個博覽會的標準表述方式。若以今日的眼光來看，臺灣觀覽者的陳述都顯得籠統而模糊，與當時在日日新報日文欄刊載介紹博覽會各館的文章相比，更顯粗漏。然而這種陳述精疏的對比，不能用「臺人智識淺漏」這樣的方式來理解，因為抱持近似觀光心態進入博覽會場的人與抱持研究學問而去觀看博覽會的人，原本對於展示的意義就會有截然不同的解讀，此其一。其次，面對博覽會龐然巨大的陳設展示，任何初次觀看的人都會有語言失聲的困擾，所見過於巨大，所聞過度豐富，已超過了一般日常語言可以承載的地步，最後只能用「妙不可言傳」來表達內心中的震憾。對比那些在日日新報撰文介紹博覽會的日本作者，多半都是已接受近代科學分科教育的知識分子，<sup>(72)</sup>臺灣傳統士紳面對博覽會時，當然也不會有任何背景知識可以讓他們用另一種截然

(70) 《臺灣日日新報》，第1476號（明治36年4月5日），漢5版。

(71) 呂鷹揚，〈觀光記事10〉，《臺灣日日新報》，第1491號（明治36年4月23日），漢4版。

(72) 吳文星曾為文討論日治初期總督府的官吏幾乎都是東京帝大的畢業生。參見吳文星，〈東京帝國大學與臺灣「學術探險」之展開〉，收於黃富三、古偉瀛、蔡采秀主編，《臺灣史研究一百年——回顧與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7），頁11-28。

不同的眼光來解剖分析博覽會中的各種細部知識。

臺灣觀覽者這趟赴日之旅所要觀看的還不只是大阪博覽會而已，走出博覽會場之後，另一個更為巨大的展示空間——日本正在等待他們的造訪。呂鷹揚及其他觀覽者對於工藝技術的震驚顯然不是來看博覽會工業館裏的陳品，而是他們在東京、大阪等地參觀工場時所得到的震撼，例如呂鷹揚在參觀大阪水源地時，發現「以一機而能應九百五十萬人之飲用，又京都水利事務所，水激電燈，舟上山行，此固奇而又奇者也！」<sup>(73)</sup>，此外，他「觀各處製造場，俱見隆盛，其中最大事業者，莫如三井綢緞布帛店、大阪紡紗公司，次則愛知物產組織工場、天狗卷煙草、王子製紙、林時計製造等。」<sup>(74)</sup> 這段描述裏，我們可以知曉，呂氏對於工業機械的印象，主要來自於「真實的」工場景觀，而非博覽會中「摹寫複製」的場景。換言之，大阪博覽會中強調的「學術與知識」的特質，給予臺灣觀覽者一種難以言喻的感覺，但是參觀各城市工場的鮮活經驗，卻給他們較為明晰而清楚的知識，使得他們可以從中獲得借鏡與模仿的機會。帶著這樣混雜著奇異驚訝、模糊又強烈的印象，臺灣觀覽者回臺之後，紛紛在各種場合抒發他們遊歷之後的感想。

## 七、臺灣觀覽者的反應

臺灣的觀覽者在明治三十六年四月中旬以後陸續返臺，回臺後，地方上多半還會舉辦各種「歡迎會」之類的活動，希望他們能將滯日所見所聞告訴鄉親，以達到第二重的宣傳效果。此外，《臺灣日日新報》還開闢了一個專欄讓這些參觀者抒發他們的感想。在這些場合裏，他們紛紛提出觀看博覽會以及赴日的心得。

呂鷹揚認為這次赴日最大的心得有三：

風俗人情之醇樸、道路街衢之清潔、物產製造之興隆。而風俗醇樸、道路清潔、物產興隆，三者之關鍵皆由於教育，教育行，而人心團結，舉凡世道所係，衛生所關，拓殖所要，無不條分縷析，極意營謀，以為國

(73) 呂鷹揚，〈觀光記事 10〉，《臺灣日日新報》，第 1491 號（明治 36 年 4 月 23 日），漢 4 版。

(74) 同上註。

家萬世之基礎也。(75)

彰化廳武東堡內灣庄富紳陳邦畿與呂鷹揚同樣感受到教育的重要性，他說這次赴日，他：

最留意以學校商務云，內地學校林立，最易栽培子弟，啓發心機。此行歸里之後，當督率家中子弟學習專門。(76)

同樣的觀點也可於新竹縣第十三區九芎林區長劉仁超及當地紳士劉如棟的觀光感言中。二劉說：

至若人材之所出，則學校尤爲第一大關係，無論何等人，皆由學校出身，方可成人，爲農商等學成就卒業，便爲上等最優之農商，將來亨利無窮，富有可期，若農商不由學校出身，愚昧無知，便是下等最劣之農商，將來謀生日絀，必致困窮，是農商之學不學，即有上下之別，其他各種學業可以類推。惟望本島人，勿膠執舊慣，勿固守舊規，凡事宜遵新法，百務應變新機，而學校一端，尤當三復致意，在在務須推廣擴充，使人咸知新學之貴，將必群起競尚，人人向化，一如內地學校之盛，則本島人庶大有福乎。(77)

此外，臺北縣第二十八區庄長盧宗文也接續前面的看法：

余此行所欣羨者，見帝國政治之隆，教化之美，國無游民，學無棄才，雖盲啞之人，皆能教之有用，男女俱皆樂業，是故國家無擾亂之原，朝廷日見富強之盛，余惟望臺島人民，是則是倣，日進文明焉。(78)

新竹廳第十六區庄長張來香甚至在看完盲啞學校後認爲「臺島生蕃，以殺人爲樂事，無禮無智，雖非盲目而竟盲心，何啻天淵之別哉。我帝國文明大啓，雖

(75) 呂鷹揚，〈記觀光所感〉，《臺灣日日新報》，第 1499 號（明治 36 年 5 月 2 日），漢 3 版。

(76) 陳邦畿，〈觀光述談〉，《臺灣日日新報》，第 1520 號（明治 36 年 5 月 27 日），漢 3 版。

(77) 劉仁超、劉如棟，〈東遊誌 2〉，《臺灣日日新報》，第 1559 號（明治 36 年 7 月 12 日），漢 6 版。

(78) 盧宗文，〈觀光日誌 5〉，《臺灣日日新報》，第 1568 號（明治 36 年 7 月 23 日），漢 4 版。

有廢人，人無廢棄。」<sup>(79)</sup>

此外，古望林也說：

歷觀內地之人物政治，及農工商業，機械鐵道，各學校等，諸般設施，見整齊，核之臺疆不及萬千分之一，自今以往，惟願臺地富豪之速興公德，建立大小學校，及共同株式會社，以經營各機械鐵道，及商業等，用附驥尾，以開利源，庶可稍沾實惠于萬一，補救于將來也，此則予之所深望也夫。<sup>(80)</sup>

除了應該普及教育，發達臺灣人的智識是觀覽者共同的想法之外，他們也注意到股份公司以及合資公司對於集資以建設大規模工場的作用。呂鷹揚認為：

觀物產各處發達，製造隨在盛行，行見一會社所立，物品所輸，動以數萬萬計，然皆以器械為力，非徒事人功也。惟是非徒事人功，故費用省約，而利益信多，一本而獲十百利者有之，一本而獲千萬利者又有之。<sup>(81)</sup>

劉子儀則觀察到各工場「不必賴用人力，能成莫大之製作。……此等諸工場事業，大抵非個人所營者，聯合設立為協同之事業居多。」<sup>(82)</sup>此一見解也可以在桃園廳第一區街長蔡路的〈觀光有感〉一文中得見，蔡氏認為：

詢其資本，輒云千萬百萬，無怪臺民之有志未逮也。抑又聞之，資本巨款，非出自一人，蓋千百人合夥建築工廠，或千萬人合夥設置一機械，集腋成裘，名曰株式會社，或曰合資會社，亦有謂某某公司者。大凡盛大工業，往往如此。組合巨商亦然，仿此法以共同興業，何業不成，縱謂臺島微區，未易比擬大阪之名勝，然而各港舟楫可通，亦利商賈，而可以振興製造之事業也……。<sup>(83)</sup>

(79) 張來香，〈東遊觀光日記5〉，《臺灣日日新報》，第1586號（明治36年8月12日），漢4版。

(80) 古望林，〈觀光日記〉，《臺灣日日新報》，第1552號（明治36年7月5日），漢6版。

(81) 呂鷹揚，〈記觀光所感〉，《臺灣日日新報》，第1499號（明治36年5月2日），漢3版。

(82) 劉子儀，〈觀光談話會〉，《臺灣日日新報》，第1506號（明治36年5月10日），漢5版。

(83) 蔡路，〈觀光有感〉，《臺灣日日新報》，第1522號（明治36年5月29日），漢4版。

而彰化廳武東堡內灣庄富紳陳邦畿更身體力行，他在日本期間，不但：

商務一途，猶所醉心而不容緩者。竊觀臺中果子植物，蕃衍如斯，盍不效內地製造法，裝以罐詰，則消售倍多，因偕一內地人三山氏，就內購入製造機器，並石油發動機輪，計費千餘金，將由近期船配運來臺，搬回彰化設置機場，則植物製造家，當以陳紳先得之矣。(84)

除了教育與集合資本以創設大工場是所有觀覽者共同的心得之外，其他一些觀覽者也注意到臺灣與日本的一些差異。例如臺北縣深坑區街長張建生、內湖區庄長張德明、陂內坑區庄長呂遷善、大坪林區庄長劉子儀（區庄長劉建勳之長男）於觀覽後回鄉召開談話會，張德明述說他赴日最大的感觸是：

警察機關之整頓，警察官吏對各人民有親切之好意，一一舉例稱揚，更稱內地下級人民之家族能協力以勤勞，因慨本島婦人昧天生自然之幸福，甘受纏足之苦痛，不能操勞動業務，自然家族中缺協力之助，各人一家生產力，較內地人位置尤劣，纏足惡習，誠宜早一日改善。

張建生不僅只是在報紙上發表感想而已，後來更身體力行，大力在深坑廳推動婦女不纏足的運動。(85)

除了讚歎日本的進步之外，我們也發現一些臺人注意到日本農村與臺灣農村差異的文字，例如臺北廳第一區街長黃應麟就有一些與眾不同的觀察，他發現：

東京市街途路，固甚平坦，而溝渠之水，竟無十分清潔……九日（四月）再閱博覽會所，其殖產場陳米麥麻豆，比臺灣產尤佳，而在東京一路，所觀田園，乃似礮瘠之地，而稻草又短小，且播種全賴用肥，耕田少用牛馬，專靠人力，農業之法，殆猶未甚得宜……。(86)

新竹縣第十三區九芎林區長劉仁超及當地紳士劉如棟也有類似的見解，他發

(84) 陳邦畿，〈觀光述談〉，《臺灣日日新報》，第1520號（明治36年5月27日），漢3版。

(85) 《臺灣慣習記事》3:8（明治36年8月），頁210。

(86) 黃應麟，〈內國觀光記略2〉，《臺灣日日新報》，第1544號（明治36年6月27日），漢4版。黃應麟文末另附上詩一首：「東瀛勝地久聞名，此日登臨逸興生，最美庶民齊樂業，維新卅載見成功。」

現京都一帶農業學校：

講究精熟故耳，但有赤牛並無水牛，其赤牛又較小樣，所以犁土不深，且每家所耕之田亦較狹少，不若本島人所耕廣多也，設使內地耕田變用水牛，可以深耕易耨，諒必收成倍豐矣。(87)

不過，儘管日本農業耕作的方法似乎不及臺灣既有的自然條件佳，二劉仍然認為臺灣在交通設施、衛生條件及工業生產等方面需要急起直追，他們二人遊後的總結觀後感是：

人不遊歷，何由開拓心胸？不專遊觀，烏能增長識見！今予等觀光既畢，乃知本島人之風度有亟應照內地作速改良，極有利益者：橋梁道路最要宏整，其通市街之大路宜造鐵道，可以倍收載運之利。若通各庄之小路，須用人力車，以免挑擔之勞。其各街庄所有宅地內外俱宜加整清潔，非但有益於衛生，居處且極爽快。其各種製造宜購機器，各項營業須求廣大久遠之計，若目下無大資本，則須湊股集資組合會社，此本大而利乃厚也。(88)

這種總結印象也可以鹽水港翁煌南的文章為代表。翁氏曾經在明治三十二年臺灣首度舉辦的「臺南物產品評會」擔任審查員，他在東渡日本觀看博覽會後，覺得家鄉鹽水港有許多事業應該要奮力改變：

其中所最感者，一則製糖機器，二則揚水機唧筒，三則天然足，四則女學校，五則株式會社，六則官民相洽。此數者，均為鹽水港廳之急務者也。鹽水港廳甘蔗繁盛，有此製糖機器，砂糖足以改良，旱魃多虐，有

(87) 劉仁超、劉如棟，〈東遊誌2〉，《臺灣日日新報》，第1558號（明治36年7月11日），漢4版。

(88) 劉仁超、劉如棟，〈東遊誌2〉，《臺灣日日新報》，第1559號（明治36年7月12日），漢6版。此一說法後來在明治36年8月12日新竹廳第十六區長張來香的文章中則予以反駁，謂：「水牛本為良畜，以鋤亦為利器，牛犁則土淺，鋤挖則土深。孟子云：深耕易耨，顯有可徵者，世之讀其書，何不察其理也。政府二十年來，不論農工商業，悉心考察，以改良二字，無時不掛於齒頰間，故其以馬以鋤者，耕耘不廣，肥料得法。業其業者，各盡其力，故其三耕九之預計，定符其望，斷不若臺人之貪多不務得，強耕白食者也。」張來香，〈東遊觀光日記5〉，《臺灣日日新報》，第1585號（明治36年8月12日），漢4版。



此揚水機唧筒，民食可以聊生，纏足以久，民俗未改，有此天然足之風，兒女子能興事業，亦免步履之艱，女子目不識丁，有此女學校，則女子識字，可助丈夫之業，亦可教養兒女性情。他如臺灣商業不振，有此株式會社，則資本充足，商業可以擴張。日本官民相洽，上能惠愛乎下，下能親切乎上，遠近之人情，即目前之人情。臺灣之民，同此耳目，同此性情，豈能自外於生成乎！（89）

總結前述的遊觀經驗，這趟臺人赴日觀看大阪博覽會的旅行，對於他們的確有許多衝擊，他們普遍認識到必須加強臺灣的教育設施，學習到合股集資創設大型工場的利益，也注意到女子受教、不纏足的重要，以及交通設施、都市景觀容貌和衛生條件的改善等等。然而，這些認識的源頭，不是來自於觀看大阪博覽會展場的結果，而是他們在「日本」這個更大的展示空間中所受到的刺激。

可是，當臺人返鄉，在各種場合中發言盈庭，議論紛紛，而且似乎雄心勃勃地想要以他們觀看博覽會的經驗來改變臺灣的現況時，當時殖民政府是否真的願意配合臺人的要求？我們可以從教育與經濟兩個面向來對照臺人的希望與日後殖民政府政策之間的關係。

從經濟的角度來看，「合資」以建大工場是臺人觀看博覽會後的一種刺激與收穫，那麼殖民政府是否也在政策上配合這種需求，而給予臺人發展資本的空間？關於這個問題，王泰升在研究臺灣的合股經營型態時，曾特別指出，日治初期臺灣傳統的合股經營型態，的確受到日本及西方的影響，不但在契約中出現與西方法律相同的名詞，在組織型態上也有些地方異於傳統的合股組織。但是殖民政府在實定法的層面並未承認臺人這種組織型態與日本民商法中的公司相同。殖民政府判定是否為日本民法中新式公司的要件，只是該公司是否全為臺人所組成，假若該公司的股東之中只要有一名為日人，即可以民商法的公司視之。直到一九二三年民商法直接施行於臺灣之後，臺人才得以自由地設立各種歐陸式的會社組織。（90）王泰升的研究給予我們一個重要的圖像，即那些參觀過大阪博覽會的臺灣

（89）翁煌南，〈觀博覽會並至東京有感〉，《臺灣日日新報》，第1569號（明治36年7月24日），漢4版。

（90）王泰升，〈臺灣企業組織法之初探與省思：以合股之變遷為中心〉，收於氏著，《臺灣法律史的建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法學叢書編輯委員會，1997），頁281-342。

人，雖然感受到新式公司組織在工商經營上所帶來的巨大利益，但是以當時殖民政府的法治環境而言，卻無法幫助臺人完成此一希望。殖民政府帶著臺人到日本去，希望「教化」臺人的智識，但是臺人回到故鄉時，卻發現這種智識的開啓卻與現實的環境之間有著明顯的落差。不過，儘管殖民政府並未因這種觀看後所挑起的欲望而給予適當的滿足，臺人仍然以自己的方式及力量完成他們在大阪博覽會中所接受的啓發。黃紹恆研究日俄戰爭前後臺灣人的資本動向時，即曾指出，一九〇三年以前，臺人對於以新式會社的組織投資砂糖事業興趣缺缺，但是在一九〇三至一九〇七年間，這種情形卻有所改觀。臺南三郊組成的「合興製糖會社」及高雄陳家組成之「新興製糖合社」首開風氣，此後陸續有好幾家地方士紳及豪強之家組成製糖會社。<sup>(91)</sup>

從教育政策來看，參觀大阪博覽會的臺灣士紳，無不以爲教育是使臺灣能向上競爭的利器。日本統治臺灣之後，總督府按照伊澤修二的教育計畫，在財政上採取補助學校教育的政策，然而這個政策一直受到質疑，認爲補助政策不公平，要求學校費用改由地方納稅人負責。是以一九〇三年之後，總督府逐年降低了補助，轉而要求地方政府及臺灣鄉紳支撐初級教育的經費。從一九〇三年開始，廳和街庄費的教育費用和國庫一樣多，一九〇六年廳縣和地方的總支出比中央多三倍。甚而只有在當地人民願意且能夠負擔的情況下才准設立新學校。<sup>(92)</sup> 除此之外，當時的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在大阪博覽會結束之後，在當年（1903）十一月十日的學事諮問會上要求不要一下子開設太多學校，也不要期待立即會有滿意的成果，臺灣人已當了三百多年的中國人，要改變外國人心靈和習俗是非常困難的，因爲「比目魚要變成鯛魚是一個長期而且漫長的過程。」<sup>(93)</sup> 不但總督府對於擴張初等教育採取保守的態度，在高等教育上更是如此。原本在臺北、臺中及臺南設立的三所師範學校在大阪博覽會舉行的前一年停辦了臺北及臺中的兩所，而臺南師範學校也在兩年後停辦，這三所師範學校全部合併，只剩下一所總督府國語學校

(91) 黃紹恆，〈從對糖業之投資看日俄戰爭前後臺灣人資本動向〉，《臺灣社會研究季刊》23（1996年7月），頁99-146。

(92) Patricia E. Tsurumi 著、林正芳譯，《日治時期臺灣教育史》（宜蘭：財團法人仰山文教基金會），頁34。

(93) 同上註，頁33-34。

師範部。<sup>(94)</sup> 至於臺人殷殷期望可以發達鄉里產業的職業教育，殖民政府也一樣採取限制的政策，將訓練職業教育的任務長期侷限在公學校的層次。臺灣開始有中等以上的職業學校，一直要等到大阪博覽會結束之後十六年才問世。<sup>(95)</sup> 殖民政府的教育政策使得臺人只能獲得初級的職業技術與知識，以提供新式行業中低階層的人力需要，而較精細的技術與知識則仍留控在日本人的手裏。

從殖民統治的政策來看，我們可以發現，臺人在遊觀博覽會後的這些認識似乎也都與日本統治臺灣後的一些施政重點密切相合，例如「斷髮、放足」是治臺初期的二大政策，發展糖業是兒玉一後藤時期最重要的殖民經濟政策，普及新式公學校則是貫徹同化主義的重要管道。臺人發言振興教育時，正好與日本政府希望地方紳士能出錢辦學的政策相符；臺人認識到合資公司對工業生產的好處也與日本希望臺人能投資與糖業或相關產業的目標相合。因此，臺人在《臺灣日日新報》上刊載的博覽會觀看心得等於是強化了殖民統治「殖產興業」政策的合理性，也進一步具有宣傳上的正面效果。然而，博覽會「文明開化」的果實卻不能與臺灣人進一步分享，因為，任何足以進一步「開化」臺人的措施都會危及日本對於臺灣的殖民統治。

## 八、結論

近代博覽會展示物品的方式、設計觀看物品的角度，一直與近代形式的統治技術的發展相互依存。現實世界先被拆解分析為各種原子單元再加以整組，然後以格狀觀景窗式 (enframed) 的主題館、國家館、地方館、展示櫥窗、地理模型、照片、統計圖表、樣品標本等方式重現。<sup>(96)</sup> 在包羅萬有的萬「國」博覽會裏，地理模型、人口統計數字、國旗、國歌、代表國家最高文化的各種文物、產品、民俗、服飾、宗教、節慶、歷史淵源與發展等等，都是展示「國家權力」不可或缺

(94) Patricia E. Tsurumi 著、林正芳譯，《日治時期臺灣教育史》，頁 19。

(95) 同上註，頁 45、65-85。

(96) 有關博覽會中格狀觀景窗式的展示方式及其背後相連的權力操作手法的問題，參見 Timothy Mitchell, *Colonising Egypt*, pp. 1-62.

的符號元素。(97) 一個國家能否在博覽會中呈顯它的國民數量、地理疆界與山川形勢、物產與經濟條件、文化風俗等內容，端看它的政府是否有足夠的權力可以將原本極為複雜而異質多樣的庶民群體，透過各種調查、統計的方式獲取上述的知識。這種調查統計的技術與知識，不僅用於國內，更常用在十九世紀以降西方帝國對殖民地的控制。(98) 日本在明治維新後銳意仿效西方，這套統治技術也在維新之後在日本初步實踐，(99) 憑藉此一經驗，日本對先後併入版圖的北海道、琉球進行了土地與人口調查的工作，(100) 在臺灣的調查，更因「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和「臺灣慣習研究會」的組成，以及本文前述的各種物產品評會，使得日本政府與學術界能以更為原子化的方式掌握理解臺灣的地理與風土。(101) 大阪第五回勸業博覽會中的臺灣館，正是統治臺灣八年之後，各種調查、統計、測繪的成果展示，而各種照片、圖表、臘像、標本就提供了觀者可以凝視監看臺灣的觀景框架。儘管建構這個圖像的過程中，伊能嘉矩策展理念與總督府展示治臺政績的差異，顯示了這個被製造出來的臺灣在再現過程中的矛盾，但是被呈現在觀眾面前一切可觀看 (readable) 的事物，其實都已經過了總督府的篩檢選擇，可觀看本身即充滿了權力的許可與運作，皇帝、皇后和太子的巡視、獻納地理模型，一方面確認了這個可觀看的正當性，另一方面則在儀式上象徵性地將殖民地整合進入帝國的體系。

然而，儘管大阪博提供了一個統一而同質的臺灣圖像，一般庶民觀看這個圖像的角度，卻未必百依百順地馴服於既有的框架。博覽會會場的空間安排、動線設計通常都體現了某種當時代的主流秩序與價值，然而人們在觀看時，卻往往是極為隨機而任意地走動，因此動線所欲表達的理性與秩序在庶民任意的行動中是

(97) Penelope Harvey, *Hybrids of Modernity: Anthropology, the nation state and the universal exhibi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6), pp. 50-59.

(98) Bernard S. Cohn, *Colonialism and Its Form of Knowledge: The British in Indi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3-15.

(99) 日本在明治維新後曾進行一系列的物產風俗的調查，一方面希望藉調查民俗以將之融入歐陸習慣法的體系，另一方面則欲藉物產調查以達到「殖產興業」的目標。參見川合隆男編，《近代日本社會調查史(I)》(東京：慶應通信社，1989)。

(100) 石田雄，〈「同化」政策と創られた觀念としての「日本」〉(上)，《思想》892 (1998年10月)，頁47-75。

(101) 有關日人調查統計與臺灣統治技術的相互關係，參看姚人多，〈認識臺灣：知識、權力與日本在臺之殖民管治〉，《臺灣社會研究季刊》42 (2002年2月)，頁119-182。

無法獲取的。一般人民被碧瓦紅牆的建築、如真似幻的臘像模型、充滿異國風味的大甲蓆帽和喫茶店裏嬌美女侍所吸引，在觀看臺灣館的漢番民俗後，一般人得到的印象仍是土匪凶番出沒的臺灣。統治意義上的再現與學術意義上的真確都被消化在庶民大眾消費與購買異國情調的好奇心之中。

不過，如果因此而全盤認定博覽會無法傳達某些主流價值理念，則屬因噎廢食。日本在一八六二年之後即認識到博覽會對於「殖產興業」與「文明開化」的作用，一九〇三年的大阪博覽會是日本統治臺灣之後，第一次得以將這塊殖民地的狀況「展示」給日本以及國際的機會。殖民政府也希望臺灣人能藉著參觀博覽會與遊歷日本國境的經驗，能使臺人興起「上國榮光」的感觸，強化臺人對殖民統治的認同。從臺人返鄉後發表的種種言論中，我們似乎看到博覽會的確達到了這些效果。日本國內教育昌盛、國無棄才，人民精勤勸業、工業進步、市容整齊、衛生良好。這一切具有現代性表面的特質，臺灣的赴日觀覽者都感受到了，而且在這樣的刺激下，他們也興起要急起直追的希望。一九〇三年之後，臺人紛紛組成合股製糖會社，<sup>(102)</sup> 留日的臺灣學生人數也逐漸增加。然而，就在臺人熱切期待急起直追的同時，殖民政府不論在產業或教育的政策上卻設上了許多關卡，不願意臺人進一步取得更多現代化的資源。我們如何理解這種對殖民地欲迎還拒的現象？

駒込武曾提出「經濟統合」、「國家統合」、「國民統合」和「文化統合」等四個角度來分析日本帝國與殖民地各種權力分合的問題。<sup>(103)</sup> 若用此四「板塊」來看大阪博覽會臺灣館的角色及臺人參觀活動的意義，則我們可以發現，第五次內國勸業博覽會試圖將臺灣館放在展示會場中，正是宣示主權延伸與將殖民地納入帝國體系的想像過程，在這個想像複製裏堆疊了無數從臺灣拆解搬運過去的模品、標本、照片，透過這些可以觀看凝視的摹本，企圖提供日本人一個理解知曉臺灣的範疇，在這個範疇裏，臺灣館要展示的是「殖產興業」下的臺灣，要展示給赴日臺灣士紳的也是殖產興業的成果，因此，從經濟統合的角度而言，大阪博覽會提供了臺人與日人一個相互觀看對方的共同眼光和焦點：經濟上的「殖產興業」。

(102) 黃紹恆，〈從對糖業之投資看日俄戰爭前後臺灣人資本的動向〉，《臺灣社會研究季刊》，頁 83-146。

(103) 駒込武，《殖民地帝國日本の文化統合》（東京：岩波書店，1997），頁 2-24。

然而，就國家統合的層面而言，一九〇三年時臺灣仍屬帝國憲法的特別法域，前一年帝國議會甚囂塵上的撤廢六三法運動，並未因此而將臺灣完全納入日本國家的統合範圍；就國民統合而言，臺人也無法享有與日本國民相同的教育權；就文化統合而言，「漸進同化主義」的統治目標正好阻隔了語言、風俗信仰上的統合。阻隔與距離正是維繫帝國與殖民地階差異不可或缺的元素，透過博覽會展示櫥窗的阻隔，人們才可能站在遠端以審視的角度觀看、分析、評判殖民地的總總；透過距離的阻隔，殖民地士紳在大阪博覽會中所見所聞最後只能失聲，就好比被複製的臘像只能供人觀賞，無法也不能發聲。人們站在觀景框窗前，既看到窗內的展品，也看到了自我的倒影。一九〇三年在大阪的這場博覽會，就好像是觀景窗前的玻璃鏡，在人們眼神交錯目光流轉之中，映射了當時異質的日本帝國構造，也映照出博覽會既真實又虛幻的面貌。

定稿日期：2002.06.12

## 徵引書目

1903 《江蘇》1-2。

1898-1904 《臺灣日日新報》。

Kornicki, P. F.

1992 〈オーストラリアの博覽會におけるジャパン〉，收於橫山俊夫編，《視覺の一九世紀——人間、技術、文明》，頁183-206。東京：思文閣。

Tsurumi, Patricia E. (著)、林正芳(譯)

1999 《日治時期臺灣教育史》。宜蘭：財團法人仰山文教基金會。

川合隆男(編)

1989 《近代日本社會調查史(I)》。東京：慶應通信社。

川野重任(著)、林英彥(譯)

1969 《日據時代臺灣米穀經濟論》。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研究叢刊第102種。

不著撰人

1899 《明治32年臺南縣農產物品評會報告》。

井出季和太(著)、郭輝(編譯)

1956 《日據下之臺政》(原名《臺灣治績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月出皓(編)

1903 《臺灣館》，臺北：第五回內國勸業博覽會臺灣協贊會。

王正華

2001 〈呈現「中國」：1904年美國聖路易萬國博覽會中的大清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近代中國的視覺表述與文化構圖，一六〇〇迄今」學術研討會。

王泰升

1997 《臺灣法律史的建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法學叢書編輯委員會。

古偉瀛

1986 〈從「炫奇」、「賽珍」到「交流」、「商戰」：中國近代對外關係的一個側面〉，《思與言》24(3): 1-18。

石田一良(編)

1990 《體系日本史叢書・思想史・II》。東京：山川出版社。

石田雄

1998 〈「同化」政策と創られた觀念としての「日本」〉(上)，《思想》892: 47-75。

園田英弘

1996 〈博覽會時代の背景〉，收於吉田光邦編，《萬國博覽會の研究》，頁9-20。東京：思文閣。

吉見俊哉

2000 《博覽會の政治學：まなざしの近代》。東京：中央公論新社。

吳文星

1997 〈東京帝國大學與臺灣「學術探險」之展開〉，收於黃富三、古偉瀛、蔡采秀主編，《臺灣史研究一百年——回顧與研究》，頁11-28。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吳密察

1991 〈明治三五年日本中央政界的「臺灣問題」〉，收於氏著，《臺灣近代史研究》，頁109-148。臺北：稻鄉出版社。

呂紹理

2000 〈「始政四十周年紀念博覽會」之研究〉，發表於行政院文建會主辦、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承辦「北

臺灣鄉土文化學術研討會」。

呂騰揚

1903 〈觀光記事 10〉，《臺灣日日新報》，第 1491 號（明治 36 年 4 月 23 日），漢 4 版。

1903 〈記觀光所感〉，《臺灣日日新報》，第 1499 號（明治 36 年 5 月 2 日），漢 3 版。

杉原四郎、逆井孝仁、藤原昭夫、藤井隆至（編著）

1992 《日本經濟思想四百年》。東京：日本經濟評論社。

芳井敬郎

1996 〈第五回內國勸業博のディスプレイ〉，收於吉田光邦編，《萬國博覽會の研究》，頁 288-304。東京：思文閣。

姚人多

2002 〈認識臺灣：知識、權力與日本在臺之殖民管治〉，《臺灣社會研究季刊》42: 119-182。

持地六三郎

1905 〈敘言〉，《臨時臺灣舊慣調查第二部調查經濟資料報告》。臺北：文閣圖書公司據明治 38 年版影印。

馬敏

1988 〈中國走向世界的新步幅——清末商品賽會活動述評〉，《近代史研究》1988(1): 115-132。

清川雪彥

1988 〈殖產興業政策としての博覽會・共進會の意義——その普及促進機會の評価〉，《經濟研究》39(4): 340-359。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編纂解說)

2000 《水竹居主人日記(-)》。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梅陰子(伊能嘉矩)

1903 〈風俗上より見臺灣館(-)〉，《臺灣慣習記事》3(6): 76-83。

椎名仙卓

1989 《明治博物館事始め》。東京：思文閣。

黃紹恒

1996 〈從對糖業之投資看日俄戰爭前後臺灣人資本的動向〉，《臺灣社會研究季刊》23: 83-146。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藏)

1903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光碟編號第 831/107 號。

臺灣總督府民政局(編)

1985(1903) 《臺灣總督府民政事務成績提要》，第九編。臺北：成文出版社。

趙祐志

1997 〈躍上國際舞台：清季中國參加萬國博覽會之研究(1866-1911)〉，《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25: 287-344。

稻垣其外(監修)、北川洗耳(編纂)

1932 《臺灣大年表》。臺北：臺灣經世新報社編輯局。

鄭梓

2000 〈戰後臺灣的第一場「產業盛會」——首屆「臺灣省博覽會」歷史影像之呈現與解讀〉，收於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主編，《回顧老臺灣展望新故鄉：臺灣社會文化變遷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313-344。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

駒込武

1997 《植民地帝國日本の文化統合》。東京：岩波書店。

錢單士厘

1985 《癸卯旅行記》，收於鍾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湖南：岳麓書社。



鍾叔河

1985 〈第一部女子出國記〉，收於氏主編，《走向世界叢書》，頁 658-662。湖南：岳麓書社。

Appelbaum, Stanley (author of the text)

1980 *The Chicago World's Fair of 1893: A Photographic Record*. N. Y.: Dover Publications, Inc.

Benedict, Burton

1994 "Ritual of Representation: Ethnic Stereotypes and Colonized Peoples." In Robert W. Rydell and Nancy Gwinn eds., *Fair Representation: World's Fairs and the Modern World*, pp. 28-61. Amsterdam: UV University Press.

Cohn, Bernard S.

1996 *Colonialism and Its Form of Knowledge: The British in Indi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Gilbert, James

1991 *Perfect Cities: Chicago's Utopias of 1893*.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arvey, Penelope

1996 *Hybrids of Modernity: Anthropology, the nation state and the universal exhibition*. London: Routledge.

Mitchell, Timothy

1988 *Colonising Egyp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Rydell, Robert W.

1984 *All the World's Fair: Visions of Empire at American International Expositions, 1876-1916*.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Exhibiting Colonial Taiwan: Taiwan Pavilion and the Fifth National Exhibition for Encouraging Trade and Industry at Osaka, 1903

Shao-li Lu

### ABSTRACT

In 1903 Japan held “The Fifth National Exhibition for Encouraging Trade and Industry” at Osaka. This was the first time Japan could exhibit their ruling efforts after seizing Taiwan in 1895, and in this context, the Taiwan Pavilion became the most focal point of the exhibition site. In order to further the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Taiwan and Japan,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called together a large number of Taiwanese gentlemen who went to Japan to visit the Exhibition. How did Japan present her first colony? In what vision did the Japanese fairgoers look and catch on Taiwan? How did the Taiwanese gentlemen watch and perceive the representing image of the Taiwan Pavilion, the exhibition site, and the landscape of Japan? Our first finding is that the idea of Ino Kanori, the designer of the Taiwan Pavilion, did not conform to that of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This contradiction reflects the heterogeneity of colonial knowledge between the bureaucrat and scholar, and the designer and fairgoer. A large number of Japanese fairgoers still considered Taiwan as the land of “the barbarian and bandit” even after they visited the Taiwan Pavilion. However, the main merits of the exhibition, “*shokusan kōgyō* (encouraging industry)” and “*bunmei kaika* (civilization and enlightenment),” were successfully transmitted to the Taiwanese fairgoers. Incompatibly, when they went back to Taiwan with these merits and tried to promote education and the economic environment,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hedged them about. Although the Osaka Exhibition offered the “*shokusan kōgyō*” merit to both the Japanese and Taiwanese fairgoers, the Taiwanese did not have the same benefit as their Japanese counterparts. The fantastic site of the exhibition was, by and large, a true representation of “heterotopia of deviation” between the colony and the empire proper.

**Keywords:** exhibition, fair for encouraging industry and trade, Osaka, *shokusan kōgyō* (encouraging industry), *bunmei kaika* (civilization and enlightenment), cultural history of Taiwan society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Era